

外交学院 2018 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试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

专 业： 外 交 学

研究方向： 中国对外关系

导 师： 陈 涛 副教授

姓 名： 乔 柯

答辩日期：2018 年 6 月 11 日

摘 要

二战前,最先完成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为了攫取国家发展的资源,摆脱西方国家对其的束缚,试图打破英美本位的国际秩序。通过鼓吹皇国史观与天皇政治的优越性,用侵略和扶植亲日政权等手段在亚洲大肆推行以日本为中心的纵向序列结构——“大东亚共荣圈”,并幻想建立日本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这一构想产生既有偶然有也必然。从政策形成角度看,德国横扫欧洲战场给日本带来危机感,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日本转变措辞,用“共荣圈”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具有一定偶然性;从思想内涵角度看,具有表里两层的必然性——表层方面“共荣圈”构想源自“亚洲主义”,历经近卫父子、昭和研究会的发展,到了松冈洋右手中,有继承又有背离。里层方面,自古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其“位置意识”密不可分,“共荣圈”构想实质是“中<西<日”这样的位置判断下的必然产物。

进一步地,日本对外政策与其“位置意识”的关系还体现在相同的位置判断往往导致相似的对外政策。通过从认识和政策两方面把德川幕府海禁时期的“大君外交体制”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行比较,肯定了上述判断,并揭示出“共荣圈”构想是日本主导的“华夷秩序”在近代的再尝试。

关键词: 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型华夷思想、位置意识、亚洲主义、大君外交体制

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I, Japan, the first modernized Asian country, was trying to break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e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in order to absorb the resources to develop itself and get rid of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By preaching the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emperor politics, using the means of aggression and supporting pro-Japanese regimes, Japan was trying to carry out a vertical sequence structure, calle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ich was a kind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ould make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apan.

The emergence of this concept is both accidental and inevitable. From the policy side, the fact that Germany was sweeping the battlefield of Europe brought a sense of crisis to Japan.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 own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changed its wording, and defined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by the wor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hich shows the contingency; From the ideological side, the inevitability shows in two levels: at the outer level, the concept of "Coprosperity Sphere", originated from "Asianism". It was developed by Konoe and his son, then inherited but also diverged by Matsuoka. In the inner level, the foreign policy of Japa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its "position consciousness"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nd the concept of "Coprosperity Sphere" is in essence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Japan's position judgement at that time, which appeared to be "China < the West < Japan".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position consciousness"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same position often leads to similar foreign policy. By comparing the "Maharaja diplomatic system"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period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from the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policy, the above statement can be affirmed. And it reveals that the concept of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as just the re-attempt of Japan-led "Hua Yi system"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Japan's Hua Yi concept
position consciousness Asianism Maharaja diplomatic system

目 录

前 言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三、 研究资料与方法	8
第一章 “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11
第一节 概念辨析	11
一、 概念界定	11
二、 概念由来	12
第二节 时代背景	13
一、 中日战争需要政治解决	13
二、 对德国欧战胜利的危机感	14
第三节 政策决定过程与内容	15
一、 “荻濑会谈”和《基本国策要纲》	15
二、 松冈洋右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16
三、 对美、对苏交涉与“共荣圈”构想的崩坏	17
四、 确定“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国策	19
第四节 内涵变化	20
一、 牵制德国的紧急措施	20
二、 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划分——“各自的共荣圈”	21
三、 包藏侵略意图的空谈	21
第二章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	23
第一节 表：“亚洲主义”理想的“下行”	23
一、 “亚洲主义”与近卫笃磨	23
二、 “东亚协同体论”与近卫文磨	26
三、 “亚洲主义”坐标图	30

第二节 里：日本“位置意识”的产物	34
一、何为“位置意识”	34
二、“位置意识”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36
第三章 “大东亚共荣圈”与日本型“华夷秩序”	41
第一节 认识角度	43
一、海禁时期的“自他认识”	43
二、“共荣圈”时期的“自他认识”	45
第二节 政策或主张角度	48
一、“大君外交体制”构想	49
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51
第三节 两时期的比较	52
一、内在逻辑	53
二、外在表现	54
结 论	55
参考文献	56
致 谢	64

前言

一、研究缘起

近几年来，中日围绕着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国关系常常陷入冰点，甚至有剑拔弩张之势。这一切的背后，可以说是崛起的中国与试图重回“正常国家”的日本之间的角力，如果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争夺。在这样的时代下，日本将自己置于国际社会的何处？意图扮演怎样的角色？又是如何理解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地区稳定，还涉及两国人民能否相互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要想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以史为鉴，研究日本在历史上对于东亚秩序的思考。其次要有科学的分析视角，考察常年处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日本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模式，它如何认识世界、采取行动，又有何特点。

（一）选题原因

本文选取“大东亚共荣圈”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共荣圈”构想是日本首次试图打破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大范围的实践。“明清鼎革”之后，日本虽然思想上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华夷秩序，但受国力所限，只停留于想象层面。经过几百年的学习和成长，到了 1940 年，日本受到德国击败英法的鼓舞，同时不满于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区别对待，由松冈洋右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试图建立天皇政治领导下，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的实体，日本的野心从此具象化。

其次，日本一直用“解放亚洲”“平等合作”粉饰“共荣圈”，不但不反省曾经给东亚人民带来的战争苦难，反而把自己置于高尚的位置，责备英美对其压迫和领导亚洲国家与之抗争，对此，有必要揭示“共荣圈”构想的思想内涵，予以驳斥。

最后，“共荣圈”构想虽源于“亚洲主义”，但又有背离，其提倡者松冈洋右鼓吹天皇政治，从皇国史观中找到日本优于一切国家的根据，这一点很像德川幕

府的海禁时期，日本儒学、国学去中国化，树立日本独特性的尝试，值得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目的

搞清“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决定过程和思想渊源，认识到该构想产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才能更好的理解日本选择这一政策的原因和逻辑，并加以批判。通过对思想内涵进行表里两方面的分析，从表层认识到——“共荣圈”构想是对近卫笃磨所倡导的“亚洲主义”、近卫文磨及其背后昭和研究会“东亚协同体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背离。从里层揭示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位置意识”下必然的选择，同时又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再尝试。通过以上论述，最直接地，可以驳斥日本一直所做的对战争目的的美化行为，理性认识“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更为根本地，可以理解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家战略的选择，并通过研究日本的“自他认识”分析其“位置”判断，从而推测日本今后可能的走向。

（三）研究意义

简要来说，本文的研究意义有以下两点：

1、理论意义

分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通过把“亚洲主义”的演变和日本型华夷秩序联系起来，有助于丰富相关的学术研究。具体来说，抓住“近卫笃磨——近卫文磨（昭和研究会）——松冈洋右”这一思想传承线路，使用坐标图来进行走势分析。通过梳理几千年来日本的“自他认识”和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位置意识”对日本对外政策影响及具体逻辑。一方面把认识和行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揭示出中日关系史上诸多事件和理论在时间和思想上具有的历时线性结构。这些尝试摆脱了分析日本时常常陷入的现实主义视角，忽略其中的民族性格、文化因素，而未能看到这些思想并非日本独创，只是华夷秩序崩塌后日本以自我为主体的重构这一事实，有助于填补理论空白。

2、现实意义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前，我们面临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而日本是我们必须重点对待的国家之一。如何与这个处境特殊、充满个性，又看不清，摸不透的邻居交往？如何构筑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都是必须认真思考的。本文在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分析中，提出从认识角度理解日本对外政策的视角，日本通过“自他认识”形成“位置”判断，并基于民族性格采取相应的对外政策。在这一观点下，上述问题都将转化为日本的“位置”或者“自他认识”问题。通过考察日本如今对中国乃至西方的认识，揣测其自我定位，就能够给中日关系的迷失提供理解途径，对未来的发展有所预见。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日对于“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主义”、“华夷秩序”、日本的中国认识等相关问题都分别有着丰富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启发和支撑依据。相比之下，文化语境不同的西方研究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但值得一提的是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①，书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刻画独有见地、十分深刻，为审视日本行为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给本文带来了莫大的启发。因此，本文主要依托中日学术界关于相关问题的前人研究，用新的逻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一）中国研究现状

中国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在某些具体判断上存在分歧。同时，这些研究表现为深纵向，少横向，因此按照涉及概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日本的中国认识相关

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②致力于解释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是如何演变的。该套丛书非常详尽地罗列了不同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其中第

① [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②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一卷为总论，第二卷（1603-1840）涉及中国“明清鼎革”后，日本海禁时期中儒学、国学、兰学学者的中国认识，是本文第二章第二节的重要依据。第四卷（1895-1945）对“大东亚共荣圈”也有所提及。该套丛书所提到的史实是本文进行分析推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提炼、模型化，本文得以探讨“位置意识”对日本对外政策影响等深层次规律性问题。此外，周颂伦《华夷变态三形态》^①则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把“华夷变态”思想细分为三种类型，但这种分析仅限于江户时期。刘岳兵的《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②认为日本的主体性选择是其对华认识变化的核心，方法是将中国对象化、类型化。相似的，赵德宇的《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③论述了江户三学对华认识的不同之处和演变机制。王屏的《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④提出日本的中国认识由中国的实力决定，具有实用主义特点。

2、日本华夷思想相关

分析传统华夷观念对日本影响的有：于逢春《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⑤，谢桂娟《华夷观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研究》^⑥梳理了华夷秩序的演变和再建。韩东育的《“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⑦《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⑧，分析了华夷秩序的本质是“自民族中心主义”，通过给参与其中的异族赋予“劣等感”，以及获得正统性的动力。

“明清鼎革”之后，日本试图摆脱中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华夷秩序，学界对此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郭丽《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⑨梳理了日本型华夷思想的形成始末，并与中国相比较。范业红《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

① 周颂伦：《华夷变态三形态》，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4期。

② 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载《历史研究》，2010年06期。

③ 赵德宇：《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

④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载《日本学刊》，2003年02期。

⑤ 于逢春：《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⑥ 谢桂娟著：《华夷观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潘畅，2015年6月提交。

⑦ 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⑧ 韩东育：《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03期。

⑨ 郭丽：《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载《日本研究论集》，2003年。

“华夷”观念》^①《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演变的研究》^②梳理了日本通过“去中国化”，逐步建立了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过程。作为具体的实践——“大君外交体制”，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学界普遍对其存在性持批判态度。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③认为日本并没有建立起华夷秩序。陈景彦《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④、李永春等人的《简论大君外交体制》^⑤认为“大君外交体制”称不上是国际秩序，最多只是一种设想。

3、“亚洲主义”相关

“大东亚共荣圈”提出之际，使用的口号，宣传的思想和“亚洲主义”有着很深的联系，两国学界都把它作为“共荣圈”构想的思想渊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内涵宽泛，变体众多，在中国学界引起过争论。本文主要依据盛邦和的相关研究，他在《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⑦划分了“亚洲主义”的范围，总结了特征：“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理论”。此外，戴海滨《近卫笃磨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⑧介绍了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磨的生平和思想。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⑨《日本昭和研究会与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⑩聚焦近卫文磨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分析了其主张“东亚协同体论”的虚假性。程文《近卫文磨思想初探》^⑪从近卫文磨的文章、言论出发，认为其思想建立在对“国际和平”的看法之上。

① 范业红：《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载《理论观察》，2014年03期。

② 范业红著：《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演变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韩东育，2015年3月提交。

③ 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④ 陈景彦：《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05期。

⑤ 李永春、张晓刚、杨华：《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载《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05期。

⑥ 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载《国际观察》，2005年04期。

⑦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历史研究》，2000年03期。

⑧ 戴海滨：《近卫笃磨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载《学术月刊》，2016年09期。

⑨ 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载《历史研究》，2015年05期。

⑩ 史桂芳：《日本昭和研究会与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⑪ 程文：《近卫文磨思想初探》，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

4、“大东亚共荣圈”相关

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①详细的介绍了日本亚太政策尤其是“共荣圈”构想的始末。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②，冯玮《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③，吕万和、崔树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④等国内文章均将“共荣圈”作为侵略理论加以批判，略显单薄。值得一提的是，游国龙的《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⑤，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认为日本是一个等级秩序，其行为目的是追求更高的国际秩序中的序列，对本文产生了非常大的启发。

综上所述，对于上述概念，国内论著均有涉及，但缺乏相互间的联系和整体的分析视角，也少见从松冈洋右的演讲、著作出发的研究，对于昭和研究会涉及也比较少，本文将在这几方面做出努力。

（二）日本研究现状

就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同样分为以下几类：

1、日本的中国认识相关

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⑥十分细致的梳理了从德川儒学到“东亚协同体论”的日本对华观，包括了福泽谕吉、冈仓天心、近卫笃磨、昭和研究会等人对亚洲的不同看法和主张。旗田巍在《日本人的朝鲜观》^⑦中指出，日本人在以西方为比较的标准时，会对亚洲产生优越感与蔑视感。佐古丞《松冈洋右的中国认识及应对》^⑧介绍了松冈洋右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及任满铁副总裁时期的中国观。山室信一《亚洲认识的基轴》^⑨介绍了日本的亚洲认识，《面向未来的回

① 臧运祜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载《世界历史》，1997年03期。

③ 冯玮：《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02期。

④ 吕万和、崔树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载《世界历史》，1983年04期。

⑤ 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载《日本学刊》，2013年02期。

⑥ 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

⑦ 旗田巍：《日本人的朝鮮觀》，载《朝鮮學報》，1969年10月，通号53期。

⑧ 佐古丞：《松岡洋右の中国認識と対応—満州事変まで》，载《法学論叢》，1987年9月，121（6）期。

⑨ 山室信一：《アジア認識の基軸》，载《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古屋哲夫編），1994年3月。

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①则提出了通过中国认识日本的新视角，“以他者的视线为媒介来形成我像”。

2、日本华夷思想相关

桂岛宣弘《思想史的十九世纪》^②把日本的华夷观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礼·文中华主义”、日本型华夷思想和日本中华主义，说明了儒者思想的演变——从崇拜中国到华夷可变，最后到“日本=中华”。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③认为日本在开国之前就有区别于中国“华夷秩序”、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独特“国际秩序”，即“大君外交体制”，这其实是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初次尝试。

3、“亚洲主义”相关

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④，从文化角度阐述“亚洲主义”，其名句“亚洲是一个整体”成为了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口号。长谷川雄一主编的《亚洲主义思想和现代》^⑤详细介绍了“亚洲主义”的诸多思想流派，另一方面讨论了华夷秩序在近代的崩坏和新发展，从宣传语言和行为上揭示了“亚洲主义”与华夷秩序存在联系。生江久《重新审视亚洲主义》^⑥分析“亚洲主义”究竟是侵略还是合作。

4、“大东亚共荣圈”相关

关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① 政策决定过程的研究。
- ② 实态研究（日军对占领地的破坏、施行的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等）
- ③ “共荣圈”的思想研究
- ④ 国际关系史中“共荣圈”的定位研究

① 山室信一：《未来への回憶：他者認識と価値創出への視点》，载《国際文化会館会報》，2003年12月，14（2）期。

② 桂島宣弘著：《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徳川日本》，東京・ベリかん社，1999年版。

③ [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④ 岡倉天心著：《東洋の理想》，東京・講談社，1986年版。

⑤ 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14年版。

⑥ 生江久：《アジア主義の見直しのために》，载《大東亜共栄圏の時代：興亜を目指した日本とアジアの歴史》（エス・ビー・ビー編），東京・政治経済研究会，2006年版。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以及背后的思想。桥川文三《东亚新秩序的神话》^①《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与实态》^②、河原宏《日本的亚洲观——大东亚共荣圈의思想和政策》^③、河西晃祐的《大东亚共荣圈》^④等都聚焦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诞生与内涵。源川真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及其归结》^⑤聚焦矢部贞治的思想，认为太平洋战争是围绕理念的战争，当时的知识阶层想要创建一个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民族自决”的国际关系原理。并指出了用“亚洲主义”强调“独立自主”和“平等互惠”的外务省同从资源确保角度认为应当主张日本优越的军队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

综上所述，日本对上述概念也有很多研究，但重在事实判断，缺乏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

三、 研究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资料

本文使用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声明，已公开的内部会议纪要，日本外务省与驻外大使的信函等。这些资料分别来自于国立公文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⑥

（二）研究方法

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史料研究法

本文既是历史研究，又是思想研究。首先，通过查询政府档案资料，阅读政策提出者们的著作、演讲及报纸文章，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情况加以了解，形成整

① 橋川文三：《東亜新秩序の神話》，載《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 4》（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東京・有斐閣，1970 年版。

② 橋川文三：《「大東亜共栄圏」の理念と実態》，載《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21》（家永三郎等編），東京・岩波書店，1977 年版。

③ 河原宏：《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大東亜共栄圏の思想と政策》，載《社会科学討究》，1975 年 3 月号。

④ 河西晃祐著：《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 年版。

⑤ 源川真希：《「大東亜共栄圏」思想の論理とその帰結——政治学者矢部貞治を中心に》，載《人文学報》，2000 年，通号 306。

⑥ 可以通过国立公文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查阅，网址：www.jacar.archives.go.jp。

体视角并加以分析论证；其次，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了解到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帮助确定研究重点。文中所引用得日本学者著作中的观点，均可于国立国会图书馆查阅；^①最后，部分学界已有详实研究的内容将不再累述，而是直接使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或作为素材，从中提炼出抽象的理论，并加以验证。例如，梳理历史上日本的“自他认识”与对外政策关系时，主要援引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②第一～四卷中的内容作为理论依据。

2、比较分析法

本文应用比较研究的层次有两个：其一是对“亚洲主义”进行分析时，归纳总结了冈仓天心、近卫笃磨、昭和研究会、近卫文磨等人的思想，通过文化、政治、经济与军事、国际关系四个维度，绘成思想坐标图以研究走势，其影响与差别一目了然；其二是第三章中，基于“位置”判断的相似性，把海禁时期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行比较，通过认知角度和政策或主张角度的具体内容梳理，发现两者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并对细节上的某些不同点作出简单解释。

（三）创新之处

本文分析“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时，提出如下视角——“位置意识”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位置”是基于自他认识相比较所产生序列结构，在外交学范畴中就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定位。日本的“位置意识”极为敏感，如果存在高于自身的客体，日本倾向于随其而动，向其学习以赶超；如果与体系最高者极为接近，日本倾向于打破现行秩序，创造供自身发展的新秩序；如果日本自认位于某体系中的最高点，就倾向于掌控整个体系。基于这一视角，本文提供了两种分析路径，横向：自他认识——“位置”判断——政策或主张，表明“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作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对外政策，正是基于当时“中<西<日”的位置判断而产生的。纵向：一对相似的“位置”判断来自于相似的自他认识，会产生相似的政策主张。在德川幕府的海禁时期，就产生了“华夷变态”的认识和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主张，这与二战时期日本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主张建立

^① 由于版权限制，仅部分支持在线浏览，网址：www.ndl.go.jp。

^②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天皇政治下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的新秩序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这种从认知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政策的尝试很少，有助于填补理论空白。与此同时也帮助理解日本的行为逻辑，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第一章 “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既不甘心居于“华夷秩序”之下，又不满足于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伺机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而“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些尝试的最高峰和最具象。这一构想是自由解放的和平倡议，还是侵略野心的华美言辞；是迎合时局的灵感乍现，还是酝酿许久的深思熟虑，学者们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的诞生有偶然、有必然，在实践中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节 概念辨析

近代以来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有许多种称谓，比如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①、宣扬“中日满”合作的“东亚新秩序”、划定日本在亚太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概念内涵交叉，又各有不同；即便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大东亚共荣圈”本身，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人手中也有不同的解释和设计。因此，我们需要先明确概念的内涵。

一、 概念界定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亚太地区政治主张：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统合东亚、东北亚、南亚、大洋洲等地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在本文中，它既是一种构想，又是一种具体的政策。这体现在，当论及松冈洋右所设计的世界秩序——“各自的共荣圈”时，它仅仅是一个构想，在推进中屡屡碰壁，最终也没能成立；^②1941年7月，近卫文磨把“共荣圈”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升级为日本国策。东条英机上台后，“共荣圈”开始走向实践，这时，它才成为日本贯穿二战时期的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

① “大陆政策”主要指以近代日本以中国为主体的侵略政策，除中国大陆外还应包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东部等地区，这称为“北进政策”。但不包括台湾、海南岛以及东南亚，这被称为“海洋政策”或“南进政策”。日本官方也不使用“大陆政策”这一说法，而称“满蒙政策”或“对华政策”。

② “各自的共荣圈”见本章第四节、松冈洋右试图获得各国对“共荣圈”承认的尝试在第三节（三）中具体论述。

常与“大东亚共荣圈”纠缠在一起的另一个的概念是“东亚新秩序”，两者有何不同？“东亚新秩序”源自1938年11月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其中把侵华战争的目的解释为“建立确保东亚永久稳定的新秩序”，具体内涵为“以中日满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关系为主干，确立东亚的国际正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①两年后的《帝国外交方针案》把“大东亚共荣圈”解释为：“依据肇国的本意，在南方诸地区确立以中日满强国结合为主干的政治经济共荣圈，使包含南洋的东亚新秩序得以具象化，从而建设世界新秩序”。^②这表明：一来，“共荣圈”就是“新秩序”的具体表达，两者的本质内涵并没有区别。二来，“共荣圈”的具体设想中增加了关于东南亚地区的内容，是“新秩序”原有范围的扩大。此外，结合后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松冈洋右为“共荣圈”注入了基于皇国史观的优越性，并试图将其打造为世界秩序。在具体的国际交涉中，“共荣圈”由于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更多的使用了“新秩序”这种相对模糊的说法，但日本在官方文件和宣传中则更多地使用“共荣圈”。

二、 概念由来

1940年8月1日，时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在题为《皇道外交宣言》的讲话中说到：“我一直以来主张把在全世界宣传皇道作为皇国的使命。国际关系中的皇道，最重要的是，让各个国家、民族各得其所。我们当前的外交方针是依据皇国的大精神，建立以中日满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③首次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说法。在10日的谈话中，松冈洋右进一步说：“……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需要 we 和相信这一点的国家的共同合作，一方面要创造这样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道路上的任何障碍，也要做好觉悟勇敢地排除。”^④自此日本采用新的措辞，取代了之前鼓吹的“大东亚新秩序”。

松冈洋右为了这一构想四处奔走，积极促进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约，试图游说美国、苏联、德国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共荣圈”构想作为政治口号十分流行，但实践中却屡屡碰壁，近乎停滞。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中，近

① “昭和13年11月3日の政府声明”，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070900。

② “帝国外交方针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100。

③ 松冈洋右：“皇道外交宣言”，《松冈外相演説集》，東京・日本国际协会，1941年版，第15页。

④ 同上，“大東亜共栄圏の確立”，第16页。

卫首相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上升为日本的国策，提出“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进一步，为了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要推进向南方的扩张。”永野修身军令部长也表示“为了确保自给自足的态势”共荣圈是必要的。^①十几天后，近卫借口内阁改造将松冈免职，“共荣圈”构想脱离了松冈的束缚，与“自存自卫”联系在了一起。10月18日，东条英机上台后，把“共荣圈”建设引向实践，通过占领东南亚，设立“大东亚省”，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共荣圈”彻底成为日本挑起“大东亚战争”的理论口实和后勤保障，在“民族解放”的谎言下变为日本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的自我满足。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是松冈洋右所创造的吗？事实上，早在1938年，隶属于陆军省军务局的岩畔豪雄中佐和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少佐就在文件中使用了“共荣圈”这一词汇；^②从外务省的记录中看，7月9日的一篇文件提到“东洋共荣圈”^③，具体的解释和后来的“共荣圈”基本一致，而此时松冈尚未供职。与此同时，26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被认为是总结自松冈起草的会议议案，却没有提到“共荣圈”，而依然使用了“新秩序”。^④由此可见，松冈洋右并非“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首创者，但一般认为他是第一个正式、具体阐述概念内涵的人。

第二节 时代背景

查看1940年7月24日写成的《帝国外交方针案》的修订稿可以发现，原本“对俄方针”部分写着“为了专注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要和苏联维持和平关系……”，此处的“新秩序”被手写修改为“共荣圈”。^⑤为什么要在这一时刻把广为流传的“新秩序”转变说法？我们要从日本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当时世界形势的认知。

一、 中日战争需要政治解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表面采取“不扩大”方针，但实际却抛开南

① “内閣總理大臣御説明案”，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184000。

② 安部博純著：《日本ファシズム論》，東京・影书房，1996年版，第385-395页。

③ “世界情勢の變動に対処すべき帝国外交施策要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0900。

④ 河西晃祐：《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年版，第31页。

⑤ “帝国外交方針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100。

京政府，^①把主导权交给华北日军，以期压迫华北当局让出更多利益，但这依然难以满足日本的野心，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的扩大，日本意识到无法迅速击败中国，战争陷入长期化泥潭。1939年，在时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的策划下，满铁内的情报调查机构扩大为“大调查部”，同时成立“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抗日力量进行研究，以期找到对华战争的出路。^②

报告指出中国的抗战能力是阶段性的，“武汉会战前是主力战阶段，此后便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在政策建议上，报告指出“全面的军事攻势将比过去任何战役都规模巨大而且困难”，“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消耗”，^③游说政府考虑政治解决对华问题，满铁调查部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囊”机构，对日本的对华认知有一定的间接影响。

二、对德国欧战胜利的危机感

希特勒上台后违反国际条约，挑起战争。继而欺骗英法两国，称“不会再有领土要求”，英法寄希望于“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但希特勒依旧大肆进犯，1939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在欧洲严峻的事态下，日本外交官们努力搜集情报，通过电报传回外务省，也影响了日本的对欧认识。8月22日，日本方面从英国得到情报，称“情况险恶，有很大的可能引发战争”，^④与此同时，又从荷兰外交部获悉“‘但泽’的事态可能会成为战争爆发的契机”。^⑤紧接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意识到“德国在准备入侵波兰”，“德意对英法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就算不会直接开战，欧洲不安定的局势也难以消除”，并在《帝国外交施策要纲 个人提案》中指出“在欧洲紧迫的局势下，帝国在远东大有可为（freehand），这是处理支那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绝好机会。”^⑥日本对欧洲战争表示暧昧的态度，以此作为合作的筹码劝说各国停止对中国的支援，但这种“解放感”并未持续很久，法国投降后，

① 即第一次近卫声明所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可以真正和帝国合作的支那新政权的建立”，见“帝国政府声明（昭和13年1月16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1110428100。

②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③ 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编：《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总括资料》总篇，1940年版，第11页，第89页。

④ “昭和一二、二八〇〇六、倫敦、八月二二日、重光大使發、有田外務大臣宛”，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775900。

⑤ “昭和一二、二七九六六、海牙、八月二一日、石射公使發、有田外務大臣宛”，同上。

⑥ “帝国外交施策要綱 私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29700。

日本开始警惕德国的胜利。1940年6月17日，外务省给驻意大利大使的电报中称：“法国在意大利参战、巴黎沦陷后，很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可以预想到德意不会咨询我们的意见，直接插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①驻美国大使判断德国将会获胜，申明了讨论“法属、荷属印度支那的领土权变更”问题的必要性。在这一时期，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德国违背了防共协定的精神，日本外务省一方面深信德国将会取胜，另一方面又深感被德国所背叛，眼看德国染指东南亚却无牌可打，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急需采取新的举措，这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产生的最大背景。

第三节 政策决定过程与内容

欧洲战争之前，日本的战略重心在中国，“东亚新秩序”也只强调中日满的合作。随着英法荷老牌殖民国家的败退，东南亚变成多方关注的目标，日本更是如此，1936年，日本有10种战略性物资来源于东南亚，其中锡、橡胶、石油、麻等商品甚至占进口总额的半数以上。如果日本控制了东南亚则会拥有源源不断的补给。反之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控制东南亚则会对日本造成重大打击。^②考虑到德国取胜不过是时间问题，日本成立“战时对策及和平对策委员会”积极研究战后世界新秩序等相关问题，新的政策也在酝酿之中。

一、“荻洼会谈”和《基本国策要纲》

亲英美派、反对与德意结盟的米内光政迫于陆军压力只当了六个多月首相就被迫辞职。面临上述的国际局势，日本急需强硬政治人物上台重新调整其对外方针，因此，提出“东亚新秩序”的近卫文麿再次登场，1940年7月19日，近卫将陆军中将东条英机、海军中将吉田善吾、以及松冈洋右召集到私邸“荻洼庄”探讨政策构想，史称“荻洼会谈”，而这次会谈的讨论议案据说是松冈起草的。^③

① “仏印問題に関する対伊申入の件、有田外務大臣発、在伊天羽大使宛”，《昭和会社経済史料集成 第十卷 海軍省資料》，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5年版。转引自河西晃祐著：《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年版，第23页。

② 吕万和、崔树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载《世界历史》，1983年04期，第52页。

③ 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载《世界历史》，1997年03期，第11页。

会谈形成的文件中“对世界政策”部分写道：“为了把东亚及相邻岛屿上的英法荷葡殖民地包含在东亚新秩序的内容中，要积极地采取措施，但要极力排除上述问题相关的多国会议。”^①这一方面显示了日本的政策开始向东南亚倾斜，另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判断德国最终会获胜，而在战后对英法的媾和会议上，如果讨论殖民地归属问题，日本可能无法独占在东南亚的利益。因此，日本开始酝酿在“新秩序”内增加对东南亚的内容，也就是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

“获濠会谈”的讨论议案被整理成为《基本国策要纲》，作为近卫文磨内阁的基本政策，于7月26日获得内阁会议通过。《要纲》开篇指出“如今的世界正面临历史性的重大转机，数个国家群的产生和发展，催生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近卫内阁对世界的认识；“皇国的国策在于，基于八纮一宇的肇国大精神，以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中日满强劲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国防与外交”部分指出“鉴于皇国内外的新形势，以发挥举国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为基础，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以执行国策；皇国现在的外交以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根本，先将重心置于中日战争的解决……”。^②《要纲》的主要内容与第二次近卫声明没有本质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认为德国胜利后，世界将形成以美国、德国、苏联、日本为领导的“数个国家群”，这是“共荣圈”构想的认识基础。

二、 松冈洋右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基本国策要纲》发表后一周多，松冈洋右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了“大东亚共荣圈”一词，如前所述。回到7月24日起草的《帝国外交方针案》，在开篇“一般方针”部分写道：“帝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在于，依据肇国的本意，在南方诸地区确立以日满华强固结合为主干的政治经济共荣圈，使包含南洋的东亚新秩序得以具象化，从而建设世界新秩序”，^③据此“共荣圈”的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日本的南进路线正式确立。

“共荣圈”一词进入公众视野的第二天，松冈会见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再次提到该构想，奥特则回答“在日本提出具体的提案之前，无法叙述德国的看法”。

① 稻葉正夫編：“組閣中四柱會議（获濠会谈）決定”（四〇年七月十九日），《太平洋への道》別卷《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版，第320页。

② “基本国策要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44700。

③ “帝国外交方針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100。

日本由于没有参与欧洲战争，生怕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损失，松冈希望能在可能的媾和会议之前，把法属、荷属印度支那等地区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并获得德国的承认。^①可见，突然提出的“共荣圈”，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劝说德国在殖民地再分配的过程中，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让给日本。但松冈对德国大使不置可否的态度很不满意，他意识到“共荣圈”不能只停留于政治口号，于是重启本来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中断“日德意合作强化”交涉，积极推动三国同盟的缔结。这样做的理由是“……不放过德意全力打倒英国的好机会，不但可以极大的减少德意胜利后战略右转的冲击，也可以防备德意对南洋态度的转变”。^②松冈希望尽快通过条约的形式把日本的利益确定下来，封锁德国染指东南亚的可能性。

9月27日，在日本的努力下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第一条即是“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指导地位”，第二条是“德国及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指导地位”。^③这里虽未使用“共荣圈”字眼，但表述很含糊，“新秩序”完全可以被日本解读“共荣圈”，因此，并未参与战争的日本仍然取得到了欧洲霸主德国的承认，可以说直接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松冈并没有就此满足。缔约的次日，松冈写成《帝国外交方针要纲》，揭露了他的外交路线——“迅速同德意强化以世界政策为基调的合作，主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时利用德苏的压力以实现日华的全面和平，继而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给英美施加压力，在德英媾和中斡旋，进一步调整日美关系，在日德苏美英间设立保障和平的机构，重建世界和平”。^④松冈所设想的“共荣圈”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秩序，他想效仿“一战”后建立的“凡华体系”，抓住欧洲战争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机会，由日本从中扮演重要角色，把“共荣圈”推广到全世界。

三、 对美、对苏交涉与“共荣圈”构想的崩坏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外交方针要纲》首次明确划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以中日满为核心，还包括法属、荷属印度支那、海峡殖民地、英领马来

① 河西晃祐著：《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年版，第31页。

② “日独伊提携強化に関する件、昭和十五年七月三〇日外務省起案”，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上，東京・原書房，1989年版，第33页。

③ “日本国、独逸国及伊太利国間三国条約”，国立公文書館，A0302238220。

④ “帝国外交方針要綱”（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B0203051200。

亚、泰国、菲律宾、英领‘婆罗洲’、缅甸等，在这些地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结合的地带。”^①可见除了法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还包括了英国、美国的殖民地，这种范围的扩大如果得不到实力强大的美国的认可，“共荣圈”构想将只是日本德一厢情愿。

1940年8月26日，松冈拜访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劝他出任驻美大使，并在其前往美国之前给予如下训令：“大东亚共荣圈，或者说依据八纮一宇的理念的这一构想，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以君临西半球、延伸至两大洋的美国来看，日本的这一理想乃至欲望也不能说是不妥当的……我国所考虑的绝非排他的占有，美国也可以参与大东亚圈的开发，所需要的资源供给绝对不会中断。”^②结合前述史料可以看出，“共荣圈”构想只着眼日本的利益，松冈为了劝说美国接受，便把美国在西半球既存的势力范围拿来相提并论，希望和美国互相承认。随着日美交涉的进展，于1941年4月达成《日美谅解案》，但当访欧归国的松冈知道后，发现其内容和自己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感到十分不满，反而阻止交涉的进行。实际上，在1940年11月曾有一次民间交涉，达成了“德鲁特备忘录”^③，其中承认了日本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在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等地确立领导地位的可能，而在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维持现状，由日美保障其不成为欧洲战争的战利品，但这一民间提案并没得到两国政府的肯定。^④随后当野村和哈尔国务卿围绕日本武力南下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时，从记录^⑤来看，野村为避免产生日美冲突，故意没有使用“共荣圈”这一字眼，隐晦的阐述了日本对南洋的经济需求，绝口不提政治诉求。随后达成的谅解案中，这些信息更是被美方删去，松冈洋右所盘算的让美国承认“共荣圈”的交涉遭遇困境。

与此同时，松冈本人则在欧洲展开交涉。1941年3月27日，松冈前往柏林会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时才得知，劝说德国拉拢苏联使其承认日本、德国在欧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当莫洛托夫来德协商加入三国条约之时，就提出了德国让渡芬兰，在土耳其设立军事基地，与保加利亚保持特殊关

① “帝国外交方針要綱”（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1200。

② 外務省編：“松岡大臣の野村大使に対する訓令”，《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5年版，第478，479页。

③ 美国玛丽诺会外国传道教会秘书长 Drought James。1940年11月25日来日同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进行会面。

④ 河西晃祐著：《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年版，第57，58页。

⑤ “大東亜会議開催に関する経緯概要（執務報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2957900。

系等条件，希明确地拒绝了。”^①在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希特勒表示“不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德军可以在数月内击溃苏联”，松冈意识到苏德关系已不可能修复，德国出面帮助日本劝说苏联承认“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

归国路上，松冈前往莫斯科，着手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在法国投降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就曾对日本大使表示，“鉴于英法荷的近况，日本在南洋面临军事、经济上的问题……苏日应该考虑双方的利益，建立安定稳固的关系。”^②但当松冈上台后，莫洛托夫又表示“日苏中立条约给予日本最大的利益，日本既可以对南方积极的行动，也改善了在北方的地位，但苏联却得到很少的利益……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会导致苏联同对中国、太平洋以及南洋抱有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从而蒙受重大损失。”^③苏联以承认日本南进为条件，试图从中渔利。对此，日方打算承认苏联对中亚地区的进出以换取苏联承认日本的南进。但从后来发表的中立条约两国政府声明部分^④来看，涵盖的范围仅包括蒙古及“满洲国”，苏联既不愿因东南亚得罪美国，也不想因侵占中亚与英国对立，莫洛托夫以“暂时没时间讨论这些”把松冈打发了。至此，松冈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在实践中屡屡碰壁，几近崩坏。

四、 确定“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国策

“共荣圈”构想不但没能得到苏联得承认，美国方面也传来噩耗。松冈归国后抱病不出，直到退任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在大本营联络恳谈会^⑤上提到这一词汇，从他本人来讲，可以说已经放弃了“共荣圈”构想。

但“共荣圈”构想依然具有政治价值，在政客的手中最终和“对英美提前开战论”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早在1940年11月，大本营联络恳谈会就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南方战争问题，并判断战争会“长期化”。^⑥随着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日美交涉的停滞以及荷属印度支那交涉的中断，日本深感世界局势的变化，认为

① “松岡外務大臣「リ」外相会談記録（要領）”，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04200。

② “東郷大使発、有田外務大臣宛”，《日、蘇中立条約關係一件》第一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4013480200。

③ “東郷大使発、松岡外務大臣宛”，同上。

④ “昭和16年4月14日 日ソ中立条約成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12120377200。

⑤ 也作“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是为了让政府与军部沟通合作而设立的协商会议，会上决定了许多“国策”。出席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重要情况下天皇也会出席，此时称为御前会议。

⑥ 大本营陸軍部戦争指導班：《機密戦争日記》，東京・錦正社，1998年版，第42页。

“英美荷对日禁运，威胁到了帝国的生存”，“美国独自或者联合中英荷等国对日本的包围态势愈发严重，帝国的国防上已无法容忍”，而面对这样的情势演变，日本“没有解决的方法”，“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而行使武力”。^①1941年6月，经过四天的集中审议，内阁通过了《随机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开篇指出“帝国无论世界情况如何变化，都会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确保世界和平的方针”，^②近卫文磨提出把“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的国策，“我国的国策已屡次在诏书中明确，就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主动确立世界和平。这一国策是不随世界情况变更改变的”，“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解决眼下的中日战争是当然的，进一步，为了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要推进向南方的扩张。”^③这样一来，推行“共荣圈”这一既定国策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因而威胁到日本的“自存自卫”；要想“自存自卫”最好的出路就是把中国、东南亚都作为日本的资源补给，也就是加快突进“共荣圈”建设，由此产生的国家间矛盾只能通过武力解决。这一恶性循环构成了40年代日本的对外关系的根本逻辑。

第四节 内涵变化

细观“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决定过程，不难发现其内涵有着如下的变化：

一、牵制德国的紧急措施

如前所述，当日本判断德国即将取得欧洲战争的胜利之时，十分担心东南亚成为欧洲战争的战利品。尽管德国大使奥特曾表示“德国并不关心南洋（法属、荷属印度支那）”，但这只是口头约定。1940年7月8日，前任外相佐藤尚武会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时，后者表示“关于法属、荷属印度支那，德国方面要看一下意大利首相的态度，很遗憾不能做出提前的承诺。”^④可见日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帝国外交方针案》上的手写修改，将原本的“新秩序”改为“共

① “对南方施政要纲”，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2120207100。

② “情势推移に伴ふ帝国国策要纲”，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183800。

③ “内閣総理大臣御説明案”，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184000。

④ “「リ」外相との会談内容 来栖大使発、有田外相宛”，《昭和会社経済史料集成 第十卷 海軍省資料》，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5年版。转引自河西晃祐：《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年版，第33页。

荣圈”，但之后的发表中并没有明确“共荣圈”的任何细节，其叙述又与之前第二次近卫声明如出一辙，可以判断，“共荣圈”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偶然性，日本突然转变广为流传的说法，用“圈”这样的封闭概念替换“新秩序”，是为了在欧洲战场分出胜负之前，先声夺人，把东南亚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从而封堵德国可能提出的殖民地再分配要求。

二、 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划分——“各自的共荣圈”

松冈洋右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后，开始筹划他理想中的世界秩序，即“各自的共荣圈”。考察他所写的《帝国外交方针要纲》^①，按照国别分别叙述了日本要采取的外交政策。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确立从近东到亚洲大陆（包括中国）的生活圈协定（相互承认日本在蒙疆以及中国北部的领导地位和苏联在外蒙古、新疆、西藏等中国边疆地区的领导地位）”；同“战败”的英国划定势力范围，“英国承认大东亚共荣圈并对此合作的话，约定保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英帝国领土”，实质是缩小了英国的殖民地；和美国划定势力范围“以太平洋分为东西两部分势力范围为前提，缔结相互不可侵犯条约（包括尊重菲律宾的独立和不可侵）”。以菲律宾不可侵为前提，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建立超越国家范畴的广域势力圈；再加上之前的三国同盟条约划定了与德、意的势力范围，松冈洋右所设想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多个国家所领导的多个“共荣圈”的共存。

更进一步，在篇尾“确立世界和平”部分，松冈想要的不仅仅是日本和这些国家互相确认势力范围的双方协定，而是“缔结日、德、意、苏、美、英六国间的和平条约”，其第一条就是“尊重各自的共荣圈”。^②可见，他的设想并不仅是眼前的国家利益，而是仿照一战后的“凡华体系”，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

三、 包藏侵略意图的空谈

对美交涉的失败意味着松冈洋右在外交决策上被架空，近卫借口内阁改造，

^① “帝国外交方針要綱”（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1200。

^② 同上。

任命东乡茂德为外务大臣。进一步地，近卫把“共荣圈”构想和日本的“自存自卫”联系在一起，为其南进政策赋予正当性。东条英机上台后，美日谈判也走到尽头，日本决定对美开战，并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转化为行动，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国会施政演讲中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确立共存共荣的秩序。”^①又在占领新加坡后说：“希望印度尼西亚民族体谅日本的真意，来合作共建大东亚，我们会尊重希望 and 传统，把你们从英美的傀儡荷兰亡命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但事实上，直到2月底的第90次联络恳谈会上，日本政客们还在讨论共荣圈、国防圈、资源圈到底有什么不同，最终答案要随局势再定夺；^③而新加坡占领演讲原稿所写的“和印度尼西亚人一同保卫东亚”在恳谈会上受到了“平等对待印度尼西亚人并不恰当”的批判，被删除了。^④由此可见战争爆发后的日本政府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共荣圈”构想，其所宣称的平等、解放、共荣也不过是欺人的谎言，“共荣圈”构想彻底成为日本包藏侵略意图的空谈。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

② 《朝日新闻》，1942年2月17日。

③ “二月二八日 第九〇回連絡会議”《大本营政府連絡會議議事録》，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2120259000。

④ “二月九日 第八三回連絡會議”，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下，東京・原書房，1989年版，第19页。

第二章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

从“大东亚共荣圈”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是为了牵制德国，维护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是对外界变化的应激反应，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共荣圈”的内容上看，又有着必然性：“共荣圈”构想首先是“新秩序”为了适应新形势所做的范围扩大；其次它与20世纪前后十分流行的“中国保全论”、“东亚协同体论”、“日本盟主论”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亚洲主义”思想的理论归结和具体实践。反过来，“亚洲主义”在表层上成为了“共荣圈”构想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但在更深的层次中，日本的“位置”判断与其对外政策一一对应，形成一条历时变化的隐秘逻辑，“共荣圈”构想则是一战后日本自我定位改变所对应的新的政策产物。从表里两方面对“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其思想内涵。

第一节 表：“亚洲主义”理想的“下行”

鸦片战争动摇了华夷秩序的千年统治，随后的一百多年间，日本萌生了亚洲意识，关于自身、中国及西方国家产生了许多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比如佐藤信渊等人的中日“连横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冈仓天心的“文化亚洲论”、近卫笃磨的“中国保全论”、昭和研究会的“东亚协同体论”乃至作为顶点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在这些思想之中，可以找到一条紧密传承的明线：创办东亚同文会，“亚洲主义”主导者之一的近卫笃磨，致力于日清同盟；认同父亲理想的近卫文磨，在昭和研究会的理论支撑下三任首相，推行着“新秩序”建设，又邀请与自己看法相近的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①最终提出“共荣圈”构想。

一、“亚洲主义”与近卫笃磨

“亚洲主义”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日本亚洲主义既不和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义完全重合，更不和左翼的

^① 近卫文磨之所以找到松冈是因为其外交构想与自己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存在着共同点。

国际主义重合。”^①体现了这种丰富性。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把“亚洲主义”的起源归于主张亚洲团结的“兴亚论”。^②国内学界对于“亚洲主义”的内涵也有过争论，盛邦和先生提出以1891年为界的二阶段发展论，把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下的亚洲观点统统纳入其中，前期包括“兴亚论”“提携论”“文化亚洲主义”，后期包括“东亚同文论”“中国保全论”“大东亚共荣圈”，^③这样一来同一面“亚洲主义”的旗帜下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真正目的又各不相同，有的人从内心希望亚洲各国平等合作，也有人希望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甚至有人鼓吹武力征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思想具有共同点——以亚洲为视野，希望各民族联合起来恢复独立性。但这样的理论最终没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亚洲的独立”异变为“日本领导亚洲”，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支撑，最终变成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理论。^④

首先简单介绍下冈仓天心的“文化亚洲主义”，理由有二：一来，日本为了联合亚洲国家，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时的采用的政治口号“亚洲是一个整体”首先来自于冈仓天心；二来，他颠覆以往不是东学就是西学的惯例，从文化上把日本置于序列的顶点。

冈仓天心在著作《东洋的理想》中写到：“亚洲是一个整体，喜马拉雅山脉分割产生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但雪的障碍却无法阻断追求究极普遍的爱的蔓延。这份爱正是亚洲民族共有的思想遗传……这一点与地中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民族不同。”^⑤虽然亚洲存在两种文明，但他们都怀有“爱”而寻求某种普遍的究极理想，在这一点上把亚洲和西方民族区别开来，成为一个整体。他认为文化统一的现实基础在于——日本自古以来通过朝鲜、中国吸纳亚洲各地的不同文化，一边保留了多样性，一边又在时代变迁中促进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日本具有反应亚洲意识全貌的遗传基因，有未被征服民族的独立的骄傲与自恃”，“能实现这些复杂的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日本才是“贮藏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宝库”，^⑥树立了日本在亚

① 竹内好著：《现代日本思想大系·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12页。

② 狭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載《東亜》，2001年8月。

③ 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載《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0-132页。

④ 同上，第132页

⑤ 岡倉天心著：《東洋の理想》，東京・講談社，1986年，第17页。

⑥ 同上，第20页。

洲文化上的优越性。进一步地，亚洲人民可以超越彼此文化的不同，怀有同一个亚洲理想，而西方民族只能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在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向东方野蛮扩张。“欧洲的光荣正是亚洲的屈辱。历史的步伐将引导向西方和我们之间无法避免的对立。”^①从而树立了东方对西方的文化优越性。

但冈仓天心的思想本身并没有给“大东亚共荣圈”赋予内涵，却作为“亚洲主义”的象征，因为政治需要而捆绑在了一起。真正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近卫笃磨“保全中国论”。近卫笃磨，号霞山，出身于五摄家^②之首，任贵族院议长，被日本天皇誉为“名门伟器”，他曾两次前往中国，与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张之洞等不同政治主张的中国要人都有过交往，“俨然为日本第二政府”^③，“其活动完全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渊源地，其理想与识见为海内外所景仰”，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④1889年，近卫笃磨出任东亚同文会会长，该组织具有半官半民性质，一方面是团结甲午战争后出现的对外关系团体，另一方面作为外务省乃至军部的外围团体，推进东洋问题的相关活动。^⑤该会主张“日清韩三国交往久远、文化相通、教化相同”，强调东亚地区悠久的历史，以此作为地区合作的基础，并赞扬文化的共同性。乍一看与冈仓的想法十分类似，但落实到具体目标则是谋求日本在东亚的指导者地位——日本“保全中国”，日本“帮助中国和朝鲜改变”，^⑥一言以蔽之，主体是日本，中国和朝鲜不过是遵从日本的客体，这一不平等的表现和明治初期的亚洲“连带论”思想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自认与西方列强比肩，在亚洲的指导者意识越发强烈，另一方面，本以为成为“名誉白人”的日本人在国际上依然被差别对待，深感“人种问题”无法解决，打算领导“有色人种”，和列强代表的“白人”站在了对立面，近卫笃磨正是这一看法的积极提倡者。

1898年，近卫笃磨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提出了“黄种人同盟论”，“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

① 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全集》第2卷，東京・聖文閣，1939年版，第4頁。

② 早先任摄政，辅佐源赖朝，九条兼实一脉，渐渐演化为五个家系，称为五摄家，轮流执掌摄政和关白职位。

③ 波多野太郎：《過去と現在：近衛霞山公五十年祭記念論集》，東京・財団法人霞山俱樂部，1955年版，第280頁。

④ 戴海滨：《近衛篤磨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载《学术月刊》，2016年09期，第150頁。

⑤ 坂井雄吉：《近衛篤磨と明治三十年代の対外硬派》，载《国家学会雑誌》，第83卷第3、4号，第72、73頁。

⑥ 長谷川雄一著：《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14年，第44頁。

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眼见列强瓜分中国，他感到：“中国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的命运。因此，应该从今天起，以友爱之情对待中国，劝诱它、开导它，使其进步、促其发奋、去其猜疑、除其妒忌，使它产生对日本亲近之心，互相合作，保护同种。”^①通过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对立，为中日联合提供正当性和必要性。在保全中国上，近卫笃磨向康有为阐述了自己的“亚洲门罗主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只有东洋人有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利。”^②日本和中国合作，防止列强瓜分中国，是日本应负有的责任，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但近卫笃磨的这一看法也遭到日本国内人士的批判，之后他把中国保全论和日本的自卫，和欧洲的合作联系起来，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国民同盟会的创会演讲上，他解释为何要保全中国，“不仅是对中国有利，实则对日本也有利。也不仅仅只对日清有利，对所有与东洋有关的国家都有利。”“把同盟会说成排斥白人主义才真正是引起白人疑惑，延误大计的”，^③对列强的态度大转弯，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也要“与列强的协调中划定日本的势力范围”，只要中国还存在，即便设立租借、建立势力范围也不能说是“领土分割”，近卫笃磨的中国保全论已形同虚设。综上所述，“黄种人同盟”只是近卫为了劝说中国接受日本领导，与日本合作的理由，保全中国也只是为了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中日合作，一开始就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二、“东亚协同体论”与近卫文磨

1904年，为了维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主张清除俄国势力的近卫笃磨，没能听到日本战胜俄国的捷报就去世了，只留下年仅14岁的近卫文磨和从事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债务。为了偿还债务，近卫文磨变卖家产，年少时的生活一度很困窘。^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对政治产生了排斥感，甚至一度认为“世上最恶俗的是政治家”。^⑤然而身为公爵的近卫文磨注定走上了政治道路，1916年成为贵

① 近卫笃磨：《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载《太阳》，1898年第1号。

② 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③ 近卫笃磨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磨日記》第3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第338-340页。

④ 城北外史著：《近衛文磨の思想と経綸》，東京・大文字書院，1937年版，第6页。

⑤ 程文：《近卫文磨思想初探》，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3期，第198页。

族院议员，1931 担任该院副议长，两年后为议长，这是政治家族所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是义务。

近卫文麿并非被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是积极思考现行的国际秩序、日本的处境和未来。1918 年 2 月，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①，对当时流行的最高价值——和平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平主义不一定会实现正义人道，军国主义也并非一定违反正义人道，重要的在于其与现状的关系”，“英美宣传的和平主义只是方便其维持现状，与正义人道没有一点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醉心于他们的美丽言辞，把和平当作人道。”近卫文麿指出，国际社会分为“拥有丰富资源和殖民地国家”和“资源、殖民地数量不足国家”^②的不均衡状况，在国际社会深陷经济危机恐慌的时期，前者诸如英美等国家可以依靠自身殖民地建立起“区域经济”，从而度过危机，但后者如日本、德国等国家并未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利，必须亲自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圈”。换言之，日本与英美之间是维持现状和打破现状的国家矛盾，要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必须建立日本主导的新秩序。“确认日本正当的生存权利，在该权利遭到不公平的压迫时，必须有与之斗争的觉悟……我们有时为了人道，必须抛弃和平”，这为后来“共荣圈”确保日本自存自卫的论述奠定了基础。近卫还认为英美垄断资本主义和人种歧视也会损害正义人道，“日本必须排除经济帝国主义和黄白人种平等这些先决问题。”这一点是对父亲的继承。

1922 年，近卫文麿承袭父业，担任东亚同文会副会长，他对父亲的理念持肯定态度，“父亲的思想，未必是侵略主义。欧洲势力不断侵入东洋，日本应当领导中国，与之合作保全其领土，其根基正是大亚洲主义。”^③1929 年，近卫文麿在演讲中称：“日本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仅从经济方面看也将走到尽头，而与拥有无尽的天然资源，无限的购买力的中国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④把日本的生存和向大陆的扩张联系起来。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近卫表示“每年近百万的人口增速，国民的经济生活更加困苦”，“为了生存只能向满蒙进发”，以争取

① 近卫文麿：《英米本位の平和主義を排す》，载《日本及び日本人》，1918 年 12 月号。

② 原文用词分别是：持てる国，持たざる国。

③ 長谷川雄一著：《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14 年版，第 155 页。

④ 霞山会編：《東亜同文会史 昭和編》，東京・霞山会，2003 年版，924 页。

“合理的领土与原料再分配”，^①积极地肯定了日本的行动。在《时值满洲事变六周年》^②一文中，近卫文麿详细论述了建立“满洲国”的意义——为日本经济打开销路；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还原“满洲”历史上的独立；阻挠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加速亚洲的复兴。其分析充满了日本本位视角和正当化侵略的华美辞藻。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中日关系遭遇巨大危机，近卫文麿重提“保全中国论”，在报纸上宣传中国曲解日本的真意，日本一直以来帮助中国阻止列强的侵略，愿意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没有半点领土要求。甚至指责中国亲近“白人”仇视日本是自取其辱。

1937年，近卫文麿组阁后，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乐观估计实力差距，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寄希望于中国“反省”，又感到被蒋介石背叛，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党为对手。随着战争逐渐长期化，近卫的政策不但没达到惩戒的效果，反而封闭了沟通的渠道。为了摆脱困境，次年11月3日，近卫文麿提出“东亚新秩序”声明：“新秩序的建设是以中日满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团结互助关系为主干，确立东亚的国际正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这正是东亚稳定，促进世界发展之所在。”^③“新秩序”可谓近卫文麿思想的集中呈现，先是把父亲的“亚洲主义”落实到“中日满”团结，不是灭亡中国而是帮助中国摆脱西方殖民成长为独立国家；再打破以英美为本位的旧秩序，建立基于国际正义，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其最终目的依旧落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近卫文麿的“新秩序”构想将父亲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亚洲主义”化为具体的政策主张，并且在道义角度进行了拔高，在中日联合角度进行了丰富，而为这些改变助力的，正是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及他们所倡导的“东亚协同体论”。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创办者是近卫文麿的同学兼好友后藤隆之助。研究会网罗日本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们，团结起来研究国内外形势，以期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④其成员有提出“东亚协同体论”的蜡山政道、发展了“亚洲主义”的三木清和为近卫文麿研究“东亚新秩序”理论的尾崎秀实，这三人的

① 千倉豊編：“世界の現状を改造せよ”，《近衛文麿清談録》，東京・千倉書房，1936年版，第254，255页。

② 近衛文麿：《満州事变六周年に際して》，载《支那》，1937年9月号。

③ “帝国政府声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28700。

④ 史桂芳：《日本昭和研究会与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第135页。

思想成为了近卫推行“新秩序”的理论基石。此外，还有受海军省之托在日美开战后制定“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矢部贞治（将在第三章中论述），由此可见，昭和研究会政府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蜡山政道提出“协同体论”正是为“新秩序”服务的。近卫声明之后，面对中日纷争加深的现状，身为政治学者的蜡山认为这“不是东亚的局部问题，而是关乎世界政治体制的世界秩序问题”，而战争是“生活共同体的地域再编成运动”。^①半年后，蜡山发表论文《东亚协同体的理论》，把它作为“日本发展的内在原理”，目的是建立“在一定地域内基于民族协同关系的‘命运共同体’”，^②这里的“一定地域”指的就是“中日满”；“协同关系”则指在国防、经济上紧密相连；“命运共同体”是为了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相区别，把日本国防可以达到的地域囊括其中，基于文化、生活的共同性，宣扬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日本共命运。至于为什么要建立“协同体”，蜡山认为内因在于东洋民族的生存、复兴和发展是同所在地域的和平建设分不开的。外因则是一战后，西洋排斥东洋，东洋急需在世界上确立自己存在的地位和秩序。而为了建立“协同体”，日本要通过先进技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提高民生，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化解抗日运动，还要找到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劝诱——蜡山改造了“三民主义”，把民生置于首位，民族被他解读为文化概念置于末位。^③蜡山所倡导的建立文化、生活共同体的想法看似很美好，但细想却有诸多破绽：首先地域的划定是按照日本国防所能达到的边界，这就意味着如果日本国力足够强胜，这一边界就可以无限扩大，这就和武力扩张没什么本质区别；其次，把民生置于民族之前，就等于只要生活富足可以不拘泥于主权形式，和殖民地也没有区别；最后，所谓的共同体，不可能排除日本的政治领导，命运也只是日本的国运。

另一位智囊三木清的思想类似于冈仓的“文化亚洲主义”，他提出“新秩序”的基础是“东亚共同文化”。不同的是，他把儒教作为东洋文化的主体，同时批判国内鼓吹日本特殊性的“日本精神论”，客观上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平等性，鼓励中日本文化结合，来孕育出超越任何一个民族的“新的东亚文化”。

^④三木的主张虽然要更加平等一些，但自身也存在破绽：首先，东亚文明复杂繁

① 蜡山政道著：《世界の变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巖松堂，1938年版，第303页。

② 蜡山政道著：《東亜と世界：新秩序への論策》，東京・改造社，1941年版，第19页。

③ 蜡山政道著：《世界の变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巖松堂，1938年版，第212，213页。

④ 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第241页。

多，能否统一为一个整体实在不好说；其次，要想做到文化的统一，光靠喊口号呼吁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有集中的政治力量来推进这个过程，因此依然无法排除日本的优势地位。

捎带一提，昭和研究会内部也吸纳了像尾崎秀实这样的日本共产党进步人士，近卫文磨还委托他做过关于“新秩序”的理论研究。他指出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落后、理论家沉浸于蔑视感和满足感。^①他虽赞同“新秩序”或者“协同体”理念，但又指出合作的根本障碍在于日本自身的帝国主义所导致的言行矛盾：一边宣称从欧美帝国主义中解放亚洲，一边积极推行大陆政策。而他所设想的“新秩序”是由脱离了资本主义的日本、中共掌权的中国以及苏联三者之间的合作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②当然，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尾崎的想法被淹没了，日本依旧无视中国，凭着内心的想象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帝国主义扭曲了“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标志着内涵丰富“亚洲主义”沦为替日本战争行径的辩护的理论，可以说是思想界的悲哀。

三、“亚洲主义”坐标图

经过选取几个相互关联的“亚洲主义”代表人物，对其观点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比较，我们从思想上把握了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东亚新秩序”这一时间段主流的亚洲观。按照盛邦和的归纳来理解“亚洲主义”的话，会比上文提到的还要历史悠久和内容丰富，那么作为“近卫笃磨——近卫文磨——松冈洋右”这一传承背后的“亚洲主义”思想，在整体的思想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这样的传承又有怎样的特征？下面将通过直观的图表来进行分析。

使用坐标图对内涵复杂的“亚洲主义”进行分类处理。在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中，采用描述的方法把“早期亚洲主义”分为朴素型、策略型和征服型，^③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定的判断依据，把划分范围扩大到整个时期的全部“亚洲主义”思想，把思想的传承与异变看作是“亚洲主义”在整个坐标系中的折线运动。如何在坐标中的如何定位这些不同的思想呢？我们可以通过

① 尾崎秀实著：《嵐に立つ支那：轉換期支那の外交・政治・經濟》，東京・亜里書店，1937年版，第3页。

② 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第279页。

③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考察它们对文化,经济与军事、政治和国际关系四个维度不同态度来进行判断(表1)。

问题如下:

- ①文化上: 是否肯定亚洲传统文化的价值? 日本文化在亚洲的地位?
- ②经济、军事上: 经济利益如何协调? 军事独立、合作还是征服?
- ③政治上: 是否谋求日本的指导者地位或实际由日本统治?
- ④国际关系: 是否建立新秩序? 是否采取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对待亚洲国家?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分类的标准设定, 对思想本身进行了特征放大和简化, 虽然不能直接划等号, 但用来定位思想, 把握其走势是足够的。

表 1: “亚洲主义” 的分类

	朴素型	策略型	征服型
文化	肯定亚洲传统的价值 日本与中国平等	肯定亚洲传统的价值 日本优于中国	皇国史观 (日本优于万国)
经济、军事	利益连带、命运相同	日本的利益最高 军事合作	资源掠夺 武力征服
政治	平等合作	日本居于指导者位置	日本领导
国际关系	反对西方扩张	打破西方秩序 建立日本中心新秩序	独占亚洲 瓜分世界
代表人物	宫崎滔天 尾崎秀实	近卫文麿	松冈洋右

具体来看, “朴素型亚洲主义” 肯定亚洲传统文化, 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日本虽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但并不会因此比中国文化先进 (但可能比亚洲其他国家先进); 亚洲国家是共命运、利益攸关的, 因此要团结合作; 这种区域合作在政治上也讲求平等;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 主张亚洲国家团结起来一同反对西方扩张。

“策略型亚洲主义” 的“策略” 指的是它虽然也肯定亚洲传统的价值, 强调

中日“连横”共同抵御西方扩张，但它的出发点不是亚洲或者亚洲国家的利益，而是日本自身的利益。因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哪个领域的合作都强调日本的指导者地位，以日本为“盟主”。而国际关系上，它一般主张打破西方本位的现行秩序，建立日本本位的新秩序。

与策略型对亚洲国家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等相对和平的手段不同，“征服型亚洲主义”则依托于皇国思想和强权理念，通过武力征服亚洲，^①把其他国家当作日本的生存食粮。

有了这样的分类标准就可以把某个具体的思想定位在坐标系中（图 1）。坐标系的纵轴是三种类别，越往上越讲究平等合作，越往下越接近帝国主义侵略。横轴罗列了文中提到的“亚洲主义”诸思想，他们之间具有时间顺序或影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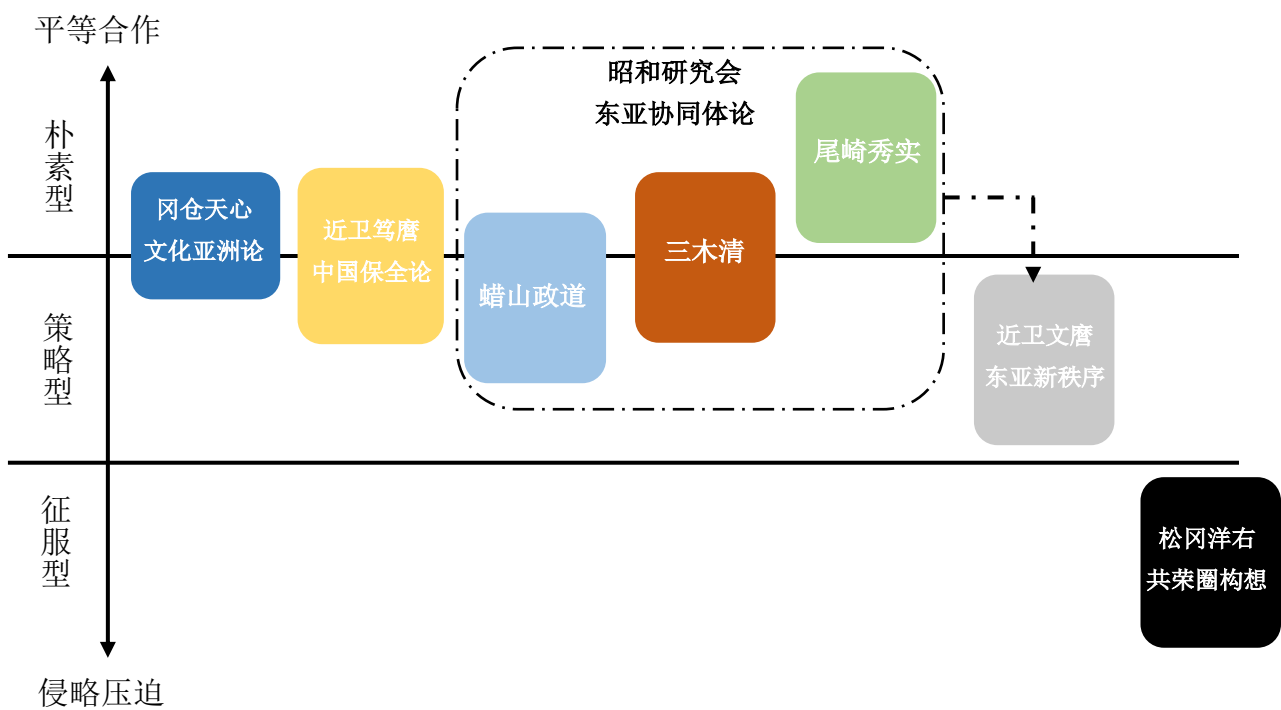


图 1：“亚洲主义”坐标图

具体来看，冈仓天心的“文化亚洲论”^②并不建议国家结成政治联盟，同时认为日本吸纳并保留了亚洲各国的文化精髓，“具有反应亚洲意识全貌的遗传基因”，因此文化上优于其他国家，故主要是朴素型，稍微向策略型偏移；近卫笃

①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9, 70 页。
② 由于冈仓的思想主要是文化层面，并未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表态，因此图中面积只有其他思想的 3/4。

磨的“中国保全论”，号召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人压迫，文化上批评国内轻蔑中国的现状，在这两个问题上属于朴素型，但他对中国的保全纯粹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上又属于策略型；昭和研究会三人中，尾崎秀实是共产主义者，从之前的分析中很容易看出他是典型的朴素型。三木清推崇儒教，批判“日本精神论”，要求平等对待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只关注本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①因此一半算是朴素型，但他的“东亚共同文化”只有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有日本的领导，故另一半属于策略型。至于蜡山政道，虽然他宣称的“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从思想主张上来看在这一点上依然可以归为朴素型，其他方面则谋求日本的利益最大化，自然是策略型；近卫文磨的“东亚新秩序”显然是策略型，问题在于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中日战争，那么他的思想里有没有征服型的因素呢？事实上，近卫文磨在手记中写到“军部现在的强大在于能把日本带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至于目标是对是错就另当别论了”，“国策如果由军人决定，无论是怎样的都是军人本位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只能停止愤慨，政治家必须更加努力才行。”^②日俄战争前他认为随意开战只会让日本成为一战中的德国而表示反对。松冈洋右在进攻新加坡问题上也批评他过于软弱。至于卢沟桥事变，主要是军部在影响决策，很难说清他支持战争的程度，不过无法压制军部导致最终战争扩大的责任是逃不掉的。综上所述，近卫文磨本人的思想整体上更接近策略型。

最后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松冈洋右，从他的著作《天皇政治与道义日本》《兴亚的大业》及演讲中，很容易观察到他是皇国史观坚定的拥护者，这一点将在第三章重点分析。而作为武力南进、占领新加坡、进攻苏联等提案的提出者，他显然属于征服型。在国际关系视角上，虽然他的“共荣圈”改自“新秩序”，但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设想依然是帝国主义划定势力范围，殖民统治的思路，背离了“亚洲主义”一贯的反对西方扩张的理念，反而是和西方国家同流合污，通过“各自的共荣圈”一同瓜分世界，这一点使他走到“亚洲主义”的边缘，和侵略思想连在了一起。而之后东条英机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则彻底滑向了侵略主义，已经不再是“亚洲主义”的范畴了。

从“近卫笃磨——近卫文磨——松冈洋右”这一条传承的明线，我们可以发

① 源川真希：《「大東共榮圈」の論理とその帰結》，载《人文学報》，2000年3月，第107，108页。

② 城北外史著：《近衛文磨の思想と経綸》，東京・大文字書院，1937年，第23，24页。

现“亚洲主义”的“异变”。如前所述，近卫文磨大部分认可其父亲的思想，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局面下，他更为关注国家生存和经济利益，加上昭和研究会给予建立“东亚协同体”的理论支持，近卫文磨开始在各个方面寻求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亚洲主义”从平等合作转向追求日本生存利益的中间态。接下来，近卫文磨邀请与其国际观点相似的松冈出任外相，后者为“亚洲主义”注入神国史观和天皇政治，“亚洲主义”开始向侵略转移。再到后来受到国内法西斯主义及帝国主义的侵蚀，长期影响日本政治的“亚洲主义”就这样一路向下，成为侵略政策的宣传假面。

第二节 里：日本“位置意识”的产物

上一节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理论入手，追溯其思想渊源，证明了该构想产生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存在的，即日本对外政策背后的隐秘逻辑。通过对历史上日本对外思想的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某种倾向性，具体表现为基于自身与环境其他客体的位置关系，日本会采取特定的对外政策。本文将这套逻辑称为“位置意识”。对“位置”的判断不同，政策或主张也随之不同。分析 20 世纪 3、40 年代日本的“位置”判断，自然地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在这种意义上，“共荣圈”不过是新时期“位置意识”的必然产物。

一、何为“位置意识”

“位置意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存在至少两个实体。如果以其中一个作为主体 A，那 A 对自身的认识就称为“自我认识”。而另一个实体 B 相对于 A 来说就是对象、客体，A 对 B 的认识就称为“他者认识”。“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也并非完全独立，按照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在看到镜子之前是认识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当他通过观察镜子里自己（他者），才意识到镜子外的生物是受自己控制的一个整体。^①可以说“他者认

^① 黄丽娟：《从拉康“镜像说”解读“他者”的含义》，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86 页。

识”帮助形成“自我认识”。与此同时，这两种认识必然是有所不同的，否则将无法对二者进行区分而融为一体。这样的不同就使比较成为可能，而比较的结果会形成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从而呈现出一种序列结构。主体对这种序列结构的认知，就是所谓的“位置意识”。

需要补充一点，国际关系学中经常使用“自我认同”来表达国家如何理解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和存在的意义，并通过“对立”的他者达到。^①从这个层面来说和本文的“位置意识”有一些重合，但两者也有区别。“自我认同”重在解决“我是谁？”“我属于哪？”，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的建构和阵营的站位。但“位置意识”并不关心身份问题，仅仅关注自我与其他客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自我认同”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位置意识”却根植于民族性格，有强有弱。

如果把“位置意识”研究视角应用到中日身上，可以解释一些问题。比如统治东亚千年的“华夷秩序”，其主体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民族，客体是周边民族，在两者的交流互动中，华夏民族逐渐意识到了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基于自身文教礼乐、社会发展的绝对优势，称自己为“华”，称周边民族为“夷狄”，产生了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感。^②基于这种优越感而形成的序列结构状似同心圆，中华居中，是世界的中心，蛮夷处边缘，崇拜中华并进行朝贡。马嘎尔尼使团的来访，清朝摆出了习惯性的傲慢，拘泥于礼节，对西方的技术、文化并不在意，在这种视西方为蛮夷的错误的“他者认识”下，得出了清朝依旧伟大的错误的“自我认识”，最终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

日本政治、历史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山室信一教授所主张的“双向视角”研究他者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他认为日本的他者研究有两种：一种是把他者作为认识对象，研究日本对其看法，以及在这样的看法下如何制定和执行内政外交政策，是一种“单向视角”；另一种则是“以他者的视线为媒介来形成我像”，在他者认识中，完成了自我认识与身份构建，是一种“双向视角”。^③江戸之前，文明发达、隔海相望的庞大土地——中国，一直是日本“唯一”的他者，

① 陈玉聃：《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7卷04期，第48页。

②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30、31页。

③ 山室信一：《面向未来的回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载《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第14-16页。

日本从中国吸取文化、学习文字、政治制度，“即使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要对此予以否定，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①，这即是“江户三学”^②树立日本特殊性的内在原因。随着西方在日本的影响加深，日本突然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成为日本的另一个“他者”，日本通过对中国、西方的认识 and 比较，形成了一维纵向的序列结构，但对三者 in 序列中的位置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明治维新的日本，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也就产生了两种理论，分别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兴亚论”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这两种看法都对日本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位置”问题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存在。

二、“位置意识”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认为“主体位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角色是结构特征，不是施动者个体特征。”“任何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体位置”，“每一个主体位置都在使用暴力方面涉及到一张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敌人姿态是相互威胁，对手的姿态是相互竞争，朋友的姿态是相互结盟”。^③但当把建构主义应用来解释日本的行为时，却遇到了问题。游国龙在《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中指出了这一点，“日本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却不像温特所描述的，把角色理解为敌人、竞争对手或朋友，形成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而是试图建立基于类家族制度的大东亚共荣圈，以与所谓的霍布斯文化或洛克文化相对抗。”^④他援引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对日本的看法：“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这种等级制可以解释日本参战的原因——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只有日本深谙等级制、各得其所的好处，因此要在日本的带领下要建立等级制的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世界。^⑤综合上述观点，这里的“位置意识”并

① [日]子安宣邦著：《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② 分别是儒学、国学、兰学，将在第三章具体探讨。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④ 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里文化解读》，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02期，第199，120页。

⑤ [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

非建构主义中角色的建构，而单纯是基于“自他认识”所形成的序列结构中，主体和客体所处于的相对位置（认识上的位置而非实际位置），在日本的情况中，这一序列结构是一条竖线，代表等级次序。日本的这种“位置意识”深深影响到其对外决策，结合日本几千年具体的实践（见表2），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倾向：

日本的“位置意识”相当敏感，当序列中有高于它的存在时，日本倾向于向对方学习，提高自身地位，或避免受到支配；当它接近或与序列中的最高者同等地位时，它倾向于打破现行秩序，建立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当他成为序列中的顶点时，则倾向于用自己理想的方式支配其他客体。

这种倾向性是日本独有的，可能源自于日本特殊的民族性格：等级制的社会对序列十分敏感；自然条件的匮乏使日本具有危机意识；包容性的文化和擅长学习使日本具有发展能力；尚武的民族血液赋予了其改变自身地位的行动力。

表 2：日本“自他认识”——“位置”判断——政策或主张之间的关系

中	日	他者认识	自我认识	位置判断	政策或主张
隋以前 ^①	~ 古坟时代	中—文明大国	中国的“宗属国”	中>日	学习中国；主动要求册封
隋唐 ^②	飞鸟~ 平安时代	中—文明大国	推古改革使日本地位提升，自主	中≥日	学习儒教、佛教；要求对等关系；争夺朝鲜
元明 ^③	镰仓、室町时代	中—文明、富硕大国	独立自主，中国拿倭寇无奈使日本认为军事实力相当	中=日	室町幕府：受册封，实际为了经济利益，遭到朝野不满 丰臣秀吉：要求对等关系，侵略朝鲜甚至欲占领中国
	江户初期 ^④	中—中华、“圣人之国”	东夷	中>日	崇拜、学习中国用儒家思想进行国内统治
明清鼎革	江户德川幕府海禁时期	儒 ^⑤ —清朝=夷狄	儒—日本=中华	日>中>西 ^⑥	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

15, 16, 31 页。
 ①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9 页。
 ② 同上，第 10-13 页。
 ③ 同上，第 15-18 页。
 ④ 同上，第二卷，第 4-20 页。
 ⑤ 同上，第 34-83 页。
 ⑥ 这段时期“位置”判断的显著变化将会在第三章重点讨论。

		国 ^② —乱世、 “人为”、 易姓革命	国—神国、 “自然”、 日本精神		“大君外交体制” ^①
		兰 ^③ —肯定西方 医学、技术； 把中国平凡化	兰— 文化不如中 科学不如西	西 \geq 中 \geq 日	兰——同时向两者进行学习 “汉兰折中”、 “慕兰存汉”
鸦片战争 到甲午战争		“亚洲主义” ^④ 中—不肖者掌 权，不懂改革， 但和日本 “唇亡齿寒” 西—文化上粗 鄙，贪婪，但军 事强大	亚洲盟主 “亚洲的藏宝库” 但科技、政治需要 学习和改革	西 \approx 日 $>$ 中	日本联合中国 共同驱逐西方 (在日本领导下)
		福泽谕吉 ^⑤ 中—愚昧落后的 半开化国家 西—文明开化	也属于半开化国家 但在亚洲最强	西 $>$ 日 $>$ 中	“脱亚入欧”， 汲取西方文明，保卫国 体，争取修改条约； 向西方国家一般对待中国
日俄战争 ^⑥ 到一战结束		中—贫困软弱， 被列强分隔是 必然之势 西—实力强大， 先进，国际秩序 缔造者	“世界第一等国” 军事前三强， 经济依赖英美	西 $>$ 日 $>$ 中	“协调主义”、 “币原外交” 和西方一起瓜分中国； 在“凡华体系”下维护 和扩大自身利益

② 同上，第 110-159 页。

① 关于“大君外交体制”构想将在第三章第二节中介绍。

③ 同上，第 172-188 页。

④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2-49 页。

⑤ 同上，第 50-62 页。

⑥ 同上，第 121-132 页。

退出国联 到“新秩序” ^①	中—依附于日本 的国家利益， 一击可灭亡 西—持てる国	持たざる国	日≈西>中	侵华战争， “亚洲门罗主义” 在亚洲建立 日本主导“新秩序” 退出国联， 和西方站在对立面
“共荣圈” ^② 到 二战结束	中—日本 “殖民地” 西—敌人， 威胁日本生存	皇国 肩负解放亚洲、 重建世界秩序 的重任	日>西>中	“亚洲门罗主义” “大东亚共荣圈” “八纮一宇” 独占中国，独占亚洲、 统治世界
二战结束到今天	如何定位，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上述表格的素材依据来源于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二、三、四卷）。通过总结归纳，表格直观地给出了日本对中国、西方的“他者认识”和“自我认识”，基于这两种认识得出“位置”判断。通过把“位置”和政策或主张进行比较，就可以观察到前面所说的倾向性。表格纵列的设计仿照原书章节分布，在中国清朝、日本江户之前，由于双方交流频率相对较少，按照朝代进行大方向的考察；清朝后期到民国这段时间，中日交往、战乱频繁，认识上不断变化，因此把重要事件作为节点。但这里有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①一段时期的“自他认识”可能有许多种，这里主要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以及确实影响到对外政策的认识或被广泛关注讨论的主张。

②个人的认识可能发生转变，但集体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整体认识发生转变之时，一般是发生了重要的事件，但这种转变也不是一夜间产生的，故节点间存在空白时间段。

③只选取精英阶层、统治阶层来进行归纳，民众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滞后性。

④模型必然需要简化，但只要把握主要特征就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使用上述观点来考察“位置意识”如何影响日本产生“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首先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他者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二战结束，日本的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大的转变。在满洲问题上，松冈洋右提出“满

^① 同上，第 218-234 页。

^② 同上，第四卷，第 331-341 页。

蒙是日本的生命线”^①，“中国没有实力抵御外敌”。军部的石原莞尔认为“中华民族尚缺乏建立近代国家的能力”，^②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认为一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虽然之后的持久战争摧毁了这一幻想，但日本始终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无视中国主权，甚至后来的“大东亚省”。基于这种“他者认识”而产生的“自我认识”，自然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指导者地位和统治合理性。

其次是这一时期日本对西方的“他者认识”，与之前相比是有变化的。近卫文麿认为英美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日本随着国力、社会的发展，现有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其生存，必须改变现有秩序以维持生存和进行发展，日本和西方国家是“秩序”挑战者和维护者的关系。但随后的松冈洋右则是皇国史观的坚定拥护者，他鼓吹“八纮一字”和天皇政治，宣传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东条英机的上台意味着日本彻底被军部法西斯主义控制，把“侵略”说成“解放”，把“战争”说成“建设”，视英美为敌人，妄想由日本打造世界和平。

不仅政府展开对西方的批判，在民间也是如此，1942年举办了一个名为“现代性的超越”^③研讨会，旨在为太平洋战争提供思想支持，虽然会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总的来说，“他们高度强调日本需要承担起用东洋精神拯救世界的责任，表现出超越西方的渴望。”^④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日本树立了对西方国家的优越性。

基于这两种认识得出的“位置”判断为“中<西<日”。此时日本认为自己处于序列的顶点，因此倾向于重塑整个世界的秩序，建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等级制的、每个国家、民族各得其所的和平世界。而这最初一步要从东亚开始，这就产生了“大东亚共荣圈”。阻止这一理想实现的任何力量都要用武力消除，这就导致日本主动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① 松冈洋右著：《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年版，第1页。

②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③ “近代の超克”。

④ 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里文化解读》，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02期，第129页。

第三章 “大东亚共荣圈”与日本型“华夷秩序”

上一章考察“自他认识”→“位置”判断→政策或主张，这一横向逻辑，从日本的民族性角度出发，证明了“大东亚共荣圈”是基于“中<西<日”判断而必然产生的。如果仔细观察上一章的表2，还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明清鼎革”之后，日本的“位置”判断与之前相比产生重大转变。实际上，一直到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中日之间几乎没有来往，日本确立海禁体制，用儒家思想统治社会，对中国认识基于稀少的商船记录，更多的是学者自身的思辨和想象。

由于缺乏外界信息的冲击，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普遍开始对自身的反思，重构认识语境，儒学、国学和兰学（学习西方），不断进行思想迭代的同时，从理论上确立了日本的主体地位。这一时期的主流是儒学，而基于儒学的位置判断是“西<中<日”，从而产生了取代中国建立属于自己的等级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和尝试。这些思想被桂岛宣弘称为“日本型华夷思想”，它们以“华夷变态”为基础，从文物制度、地理自然、血脉传承等方面宣扬日本“内部”的优越性，以熊泽蕃山、山鹿素行为代表。日本型华夷思想进一步发展、加深，最终明确了“清朝=夷狄”“日本=中华”，从而展开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批判。^①

这段时期日本“位置”判断“西<中<日”与“共荣圈”时期的“中<西<日”十分相似，日本都是序列的顶点，区别只是中国和西方的位置相交换而已。那么它们所对应的政策主张是不是相似的呢，两者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关联？产生这种“位置”判断背后的思想认识是不是类似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为此先梳理一下论证的逻辑。

^① 桂島宣弘著：《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徳川日本》，東京・ペリカン社，1999年版，第167-1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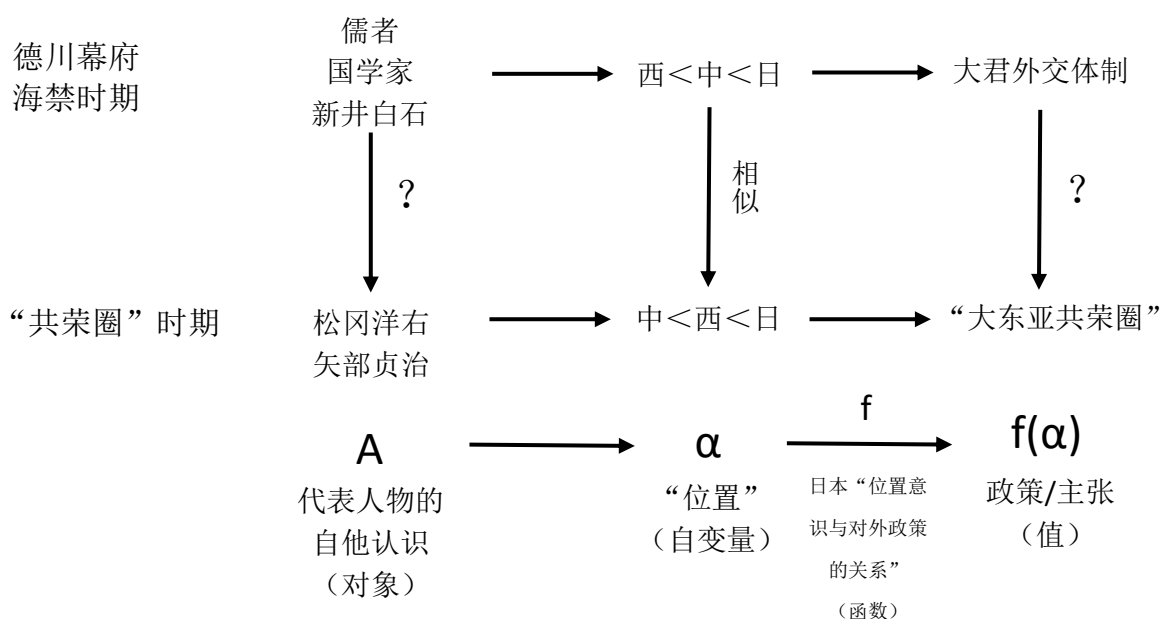


图 2：海禁时期与“共荣圈”时期的比较图

①横向：把内容复杂、观点众多的“自他认识”抽象为简单的模型——“位置”，“位置”充当自变量抓住对象的特征。日本的“位置意识”与其对外政策之间所存在的倾向性视为一个一一对应的函数，政策或主张是该函数的值。例如，给定“日 < 西”，对应政策为“西学”，给定“日 > 中”，对应政策为“树立日本对中国领导地位”。

②纵向：选取两个时期，从而形成对象、变量、值三对纵向关系。由于倾向性是一一对应的函数，给定相同的“位置”应该对应相似的政策或主张。另一方面，形成相同“位置”的“自他认识”也应当具有相似性。

如图，由于海禁时期和“共荣圈”时期日本在序列中的位置均可以拆解为“日 > 中，日 > 西”，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对中、西方的政策应该也是相似的。即“大君外交体制”和“大东亚共荣圈”存在相似性。而海禁时期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对外认识也应该与松冈洋右的对外认识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这就说明了，“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从其本质上来说不是创举，只是三百年前日本儒学、国学思想换了一个包装，在后世的重现，“共荣圈”构想也只是当时由于国力所限，范围很小、内容简单的“大君外交体制”，进一步说，日本型“华夷秩序”在近代的再次实践。这揭穿了“共荣圈”构想的本质，证实了日本政府及部分学者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解放亚洲、共存共荣、建立和平世界等溢美之词是不折不扣

的谎言。

第一节 认识角度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首先从“自他认识”角度入手。“明清鼎革”的发生给海禁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带来强烈震荡，尤其体现在儒学、国学学者对华、对日认识的变化上。到了“共荣圈”时期，日本社会的对华认识趋于稳定，却开始关注如何重新认识西方以及如何在西方文明下发现日本。这一点可以从松冈洋右和矢部贞治的世界认识中看出。

一、海禁时期的“自他认识”

德川幕府成立之初，为了寻找一种便于统治的等级制意识形态，摆脱佛教世界观的束缚，而把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树立为最高规范，思想界可谓“独尊儒术”，并视中国为“模范”。^①但随着“明清鼎革”的发生，东亚政治秩序开始巨大变革，日本思想界也走向分裂，儒学提出“华夷变态”，国学提出“神国观”，兰学则一方面在文化上肯定中国，另一方面在技术上推崇西方。虽然思想界“百家争鸣”，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中日之间的“位置”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逆转。

江户幕府儒官林春胜、其子林信笃根据“唐人风说书”^②中记录的清朝情报编撰成册，题为《华夷变态》。开篇写着：“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顷闻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其胜败不可知焉。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③所谓的“华夷变态”即是视明朝为“华”——认可其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贬低清朝为“夷”——蔑之为鞑靼、奴儿部、鞑虏、奴酋。把“明清鼎革”解读成“华”变于“夷”之态，并对此感到十分惋惜、鄙夷，甚至期盼明朝恢复统治，“夷”变回“华”，自此在日本学者眼里，原本绝对的“华夷之辨”，变成相对的“华夷可变”，太宰春台则提供理论依据，称“中华”“夷狄”的区别不是地理或种族而是“礼乐”

① 赵德宇：《日本“江户三学”的中国认识辨析》，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第89页。

② 由于日本施行海禁政策、只允许少数国家的商船在长崎进行贸易，为了掌握清初中国的情况，幕府设立唐通事（即中文翻译），通过询问入港唐船（中国船）船长，形成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告书，交付长崎奉行，再向江户报告。

③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序言，东京·东洋文库，1958年版，第1页。

这种文化指标，“中华之人若无礼仪，亦与夷狄同，四夷之人若有礼仪，则与中华之人无异。”^①

如果说《华夷变态》只完成了对中国的“降格”，接下来的日本型华夷思想则同时“提升”了日本在华夷秩序中的地位，在儒学范围内完成了中日相对位置的逆转。这一时期的儒者们从以下四个角度出发，展开“中国=夷狄，日本=中华”的论述，奠定了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理论基础，和武力实现的秩序的合法性。

第一，文化继承：雨森芳洲认为，中国自周以后背弃“圣人之训”，而日本“前有七圣，后有五圣，积德累善，率真为治……养成一国万世仁厚忠质之俗”，^②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清朝人“悉皆剃头，毫无中华体态”，根本就是夷狄。山鹿素行把“中国”一词解释为文化正统性和优越性的代名词，认为汉唐都不得圣人之道，宋儒根本是“异端”，称中国为“异朝”，只有日本才是“中国”、“中朝”。^③

第二，血统传承：山崎暗斋和浅见絅斋都反对“汤武放伐”，认为中国的“易姓革命”不过是乱臣贼子篡夺天下，早已不是正统。但日本天皇秉承神的意志，其统治“万世一系”，延绵不绝。^④

第三，水土论：山鹿素行基于水土论的地理史观，认为水土沃而人物精之处方为“中国”。日本因为“天地自然之势”，“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阴之险……万国之华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则“本朝之为中国”。^⑤

第四，尚武：熊泽蕃山认为日本是“文武兼备”的“武国”，因为“仁”所以“武”，长久以来中国武艺衰败，到了清朝又成了“不仁而近禽兽”的“勇国”。^⑥山鹿素行干脆把天皇称为“武神”，把日本征服虾夷，侵略朝鲜等行径描述成“武德大盛”，“如期威武，外朝亦不可比伦”，从而证明日本应该用武力获得和维护“中国”地位，激发了日本人源于血液的尚武精神，为后世的侵略埋下伏笔。

① 太宰春台：《经济录》，载《日本经济大典》（第9卷，滝本誠一編），東京・啓明社，1928年版，第432页。

② 雨森芳洲著：《芳洲文集》（雨森芳洲全書卷2，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日中文化交流の研究」歴史班編），大阪・関西大学出版・広報部，1980年版，第12页。

③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④ 同上，第76页。

⑤ 山鹿素行著：《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第12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233-235页。

⑥ 熊泽蕃山著：《集義和書》，载《日本思想大系 30》（後藤陽一、友枝龍太郎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179, 180页。

这一时期的儒者如何看待西方呢？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被当成“南蛮文化”，由于发展迅猛，对当时统治阶级构成威胁便遭禁止，但有关科学和技术的书籍还是得以流传，因此部分儒者得以从西洋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秩序，但要注意的是主流儒者依然把西方看作蛮夷，并排斥其文化。出身天文世家的西川如见认为五大洲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地位却不平等。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未亚三界中，亚细亚最高。又把万国分为三等，最低等“外夷”是不使用汉字的国家。^①作为幕府六代将军的重臣，维护“大君外交体制”的新井白石不认可西方文化，称基督教不过是佛教的“亚流”，“荒诞粗陋，不足为辩”，但“彼方之学仅精于形与器”，^②对西方的技术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也有着相似的结论，但论证过程却不同。国学致力于去中国化、排斥儒佛，主张从古籍中重新“发现日本”，通过研究古日本原有文化，吹嘘日本为神国，是万国中最伟大的国家，通过赞颂日本古代社会之美好，从而呼吁在全世界行“日本之道”。^③国学大成者本居宣长从日本神话《古事记》中寻找依据，认为世间存在永恒的“真道”，正是“天照大神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且广及于四海万国，只传与日本。”^④这句话信息量很大，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代，“真道”通过血脉在历任天皇中传承，因此天皇又是最高的规范，天皇的政治就是神的政治；“真道”具有普遍性，是“四海万国”都应该遵从的；而只有日本得到了“真道”，这就意味着日本是万国之首，树立了绝对优越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儒学还是国学，这一时期日本思想者们一面通过改变“华夷”的判断标准，得出“华夷变态”或进一步，日本才是“中华”的结论。另一面转向古典、神道或武士道等日本传统文化，通过论述日本的特殊性提高日本的地位，甚至得出“优于万国”的结论，因此“西<中<日”的位置判断是成立的。

二、“共荣圈”时期的“自他认识”

日本为了消除中国的影响，几百年来极尽所能贬低中国、抬高自己，甚至借西洋政治、科技批判中国是“固陋之国”。但这些终归是主观上的认识，现实中，

① 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② 新井白石：《西洋紀聞》，载《日本思想大系 35》（松村明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19，78页。

③ 赵德宇：《日本“江户三学”的中国认识辨析》，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第92页。

④ 本居宣长著：《增补本居宣长全集》第9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27年版，第480页。

日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是传统的文化大国，军事威胁。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一扫军事上的恐惧感，现代化建设飞快地提升国力，也让日本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不屑一顾。日本占领“满洲”之后，许多人来到中国游历，留下了中国人“不洁”、“生活原始”、“文化程度低下”等负面印象，并在国内大肆传播。^①陆军中将石原莞尔认为，“满洲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②通过“无法建设国家”的中国和天皇制下富国强兵的日本的相比较，以此作为“满洲”在日本领导下独立的正当性。可见，整个日本已深深种下了蔑视中国的观念。

接下来列举战前提出并积极兜售“共荣圈”的松冈洋右和二战中为政府、军部研究“共荣圈”合法性的矢部贞治，考察两者的自他认识。

（一）松冈洋右

在上海担任过外交官，又出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可以说其半生都在为日本在中国的事业而奔走。他继承了满铁初代总裁后藤新平的“满洲是大陆发展的第一步，东洋全局福祸所依”，和社长山本条太郎的“产业立国论”等观点，认为“满洲是东亚全局保持稳定的关键”。^③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松冈出版《动荡的满蒙》一书，完全否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并拿“满洲”的繁荣发展，和中国本部的混乱不堪相对比，肯定日本的功劳。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恐慌下，松冈强调“满洲”作为日本“生命线”的重要性，一方面积极主张政府干涉，另一方面极力回避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矛盾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松冈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

松冈洋右是坚定的皇国史观、天皇政治的拥护者，这一点从他的演讲和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常常援引国学中的神国思想，为日本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中日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发起支持战争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松冈在演讲中号召日本人“坚忍持久”，“满洲事变不过是‘大义在世界中扬名的一个过程’”，而所谓的“大义”要追溯到日本建国之时的神武天皇诏敕——征服四面八方建立都

① 日本杂志《旅》就记录了这些见闻，参见杨沛：《雑誌『旅』に見られる近代日本人の中国観について》，载《立教大学ランゲージセンター紀要》，2015年10月号，第74，75页。

② 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第292页。

③ 佐古丞：《松岡洋右の中国認識と対応—満州事变まで》，载《法学論叢》，1987年9月号，第84，85页。

城，把世界置于一个屋顶下，不也很好吗？^①松冈进一步推理，基于这样的精神，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侵略、榨取，“八纮一字”的口号也不是争夺世界，“那样的说法太小气了。应该是世界向我们皈依，沐浴在天皇的统治之下”，以此宣扬日本统治世界的合理性。

何为天皇政治？松冈评价欧美的政治是“帝王的权力”和“人民的自由”的矛盾关系，两者此消彼长，虽称为“帝国”，但君主没有实权。但日本不同，“天皇意识越重，人民的自由和福祉越多”，“天皇政治这一观念，是欧美所不具有的，除了日本，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天皇，也就没有天皇政治，因此这是万国所无法比拟的国体。”^②进一步，松冈说道，日本的天皇对世界肩负责任：“亿兆人中哪怕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所在，都是朕的罪过”这样的圣旨，正体现了天皇的本质，在世界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呼吁日本人找回传统，拥护天皇政治。

松冈还在言语上讥讽中国，进一步树立心理优越，“日本人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近代以来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事……要是没有明治维新，支那之流就会被欧美国家瓜分，成为他们的办事处，我们连要惩罚的对手都没有了。”^③松冈洋右对日本近代史上的三件大事如此评价，甲午战争是日本受不了中国的“暴戾”，不得不施以惩罚，别无他图，只是偶然的暴露了支那的腐败脆弱；日俄战争是日本阻止俄国扰乱远东秩序，非白人的小国日本能做到这等伟业，给了世界上的弱国以希望；退出国际联盟是因为欧美所谓的“和平”限制了日本发展的空间，现在世界上通行的秩序是“伪善”，日本绝不会对此低头。那什么才是真正好的国际秩序呢？松冈回答：“向世界宣传皇道，是我们建国的使命。从国际关系上看，就是让各国、各民族在世界上各得其所。”^④“在国内，立足于道义的社会观，建立相互依存的整体；在国际上，从道义的世界观出发，以人类共存共荣为目的。”^⑤松冈用“道义”做掩护，辩称日本并非纳粹。

（二）矢部贞治

在实践中，日本政府发现国内十分有影响力的“八纮一字”口号，在国际上

① 原文：“六合を兼ねて以て都を開き、八紘を掩いて宇と為さん事、亦可からずや”，松岡洋右：《須らく堅忍持久せよ》，東京・国民精神総動員中央聯盟，1938年版，第4页。

② 松岡洋右著：《道義日本と皇道政治》，東京・政党解消聯盟出版部，1935年版，第25-27页。

③ 松岡洋右著：《須らく堅忍持久せよ》，東京・国民精神総動員中央聯盟，1938年版，第7页。

④ 松岡洋右：“我民族的理想實現に邁進”，载《松岡外相演説集》，日本国际协会，1941年，第54页。

⑤ 松岡洋右著：《道義日本と皇道政治》，東京・政党解消聯盟出版部，1935年版，第3，4页。

收效甚微，急需找到一套新的理论来为“共荣圈”提供的合法性。在当时的知识界，把“大东亚战争”看作是“自由”、“平等”、“民族主义”等欧美价值，与日本试图建立的“等级制”社会之间的理念战争。如何打破基于“民族自决”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同为昭和研究会成员的矢部贞治，接受了政府、军部的委托，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世界认识，对政策造成了影响。^①

矢部贞治对西方国家，乃至国际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现行国际秩序——国际联盟，只是照搬了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即世界”这一传统观念，目的是“战胜国”压迫“战败国”，实质是“维持现状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并不能代表和平。其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强调“民族自决”反而刺激地区纷争，把世界带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而战火之中，真正的防守只有进攻。^②

第二，批判共产主义——即便通过阶级斗争，让“打破现状国”统治“维持现状国”，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③必须建立能使这一对“矛盾”消失的新秩序，即国际“共同体”。

第三，“有机的等差关系”——基于各民族的实力和发展，以有实力的民族为中心，确保各民族团结合作，建立“不平等的指导者政治”。

第四，“指导者”与“被指导者”并非权力专制的关系。指导者要有道义和责任感，不时反省自己的领导；被指导者则要冷静、消除反抗的意识。^④

矢部贞治通过否定西方国家的最高价值“自由主义”，指出了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和平的虚伪性，继而把国内天皇政治的等级制度表述为“有机的等差关系”，用逻辑论述包装一番，鼓吹其优越性，主张应在全世界推广。这与海禁时期，否定东亚最高价值“华夷思想”，并树立日本神国优越性的思路可谓如出一辙。

第二节 政策或主张角度

日本企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华夷秩序”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平安末期，由

① 源川真希：《「大東共榮圈」の論理とその帰結》，载《人文学報》，2000年3月号，第107,108页。

② 矢部贞治：《欧州における戦争の危機》，载《改造》，1937年8月号，第56页。

③ 源川真希：《「大東共榮圈」の論理とその帰結》，载《人文学報》，2000年3月号，第117页。

④ 矢部贞治：《第一線 指導者と被指導者》，载《読売新聞》，1940年10月17日。

于唐朝国力衰弱，日本曾一度把大唐称为自己的“藩属”，1610年，本多正纯在给明朝的书简中称朝鲜、琉球向自己入贡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都“上书输贡”，以表明日本也有自己的“华夷秩序”。^①但限于当时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悬殊，这些想法不过是自我吹嘘。“明清鼎革”对东亚秩序造成的余波，在周边民族的心理不断激化蔓延，也为日本摆脱中国影响，建立属于自己的“华夷秩序”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后世日本学者称这一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为“大君外交体制”，认为“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日本独特的国际秩序，因当时把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②但部分国内学者则认为这一制度并未建立起来。^③事实上，构想和秩序是两回事，把“大君外交体制”称为第三种国际秩序的确言过其实，但日本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意愿和行动也是能观察到的。而这样的尝试，在二战时期真正迎来顶峰。

一、“大君外交体制”构想

1636年“柳川一件”^④后，幕府把对朝外交交给对马藩全权负责，但又通过“以酹庵轮番制”强化监管，直接介入外交过程。^⑤幕府通过诸多举措，逐渐建立起“与中国、荷兰通商，与朝鲜、琉球、虾夷通信”的“大君外交体制”。

（一）对朝鲜方面

幕府重臣新井白石认为，日本要想谋求对中国的对等地位，必须首先保证对朝鲜的优越地位。由于“明清鼎革”的出现，朝鲜也深受影响，产生“小中华主义”，加上对马藩此前为了贸易利益伪造国书竭力讨好，朝鲜实际上把日本当成自己的“属国”。为了扭转日朝地位，新井改革了接待朝鲜通信使的制度，通过

① 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第49页。

② [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18页。

③ 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第55-60页。

④ 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家臣柳川调兴之间围绕对知行地（领地）和朝鲜外交问题引发对立，1635年经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裁决宗义成获胜。

⑤ 李永春、张晓刚、杨华：《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载《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05期，第70页。

简化仪式、降低规格把朝鲜国王和日本将军置于对等地位，但将军至上还有天皇，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朝鲜实际上是日本的“臣子”。

（二）对中国方面

幕府废止了外交文书中的明朝年号，试图与中国划清界限，并对来日中国人“以夷相待”。^①进一步，新井白石主持修订中国日民间贸易规则，1715 年又颁布《正德新例》，通过给中国船只发放“信牌”，限制交易数额。信牌上写有日本“正德”年号，规定“发信牌前，船主必须表态服从新的律例……定额外的货物采取物物交换……违令及无故久留者，一律拒发信牌。”^②幕府此举一方面是“锁国”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仿效明朝的“堪合”贸易。“物物交换”好比朝贡和还礼，“信牌”好比明朝颁布的交易许可“堪合”。由于清廷只当这是商人间的记号，没有加以阻止，日本便认为，这是中国遵从日本法律、认可其秩序的象征。

（三）对琉球方面

1609 年幕府批准萨摩藩讨伐琉球，把琉球变为萨摩藩的“附庸”，要求“每当日本的新将军上任，以及琉球王袭封时，琉球须派遣使来日本谒见将军。”^③但出于对中国的畏惧，日本并没有禁止琉球向中国“朝贡”。

（四）对虾夷方面

日本一直以来都视虾夷为“东夷”，与虾夷的关系一直维持在叛乱与镇压的反反复复，但原始部落终究抵挡不住日本的侵略，只得接受日本的统治。^④德川幕府在松前藩设立“和人地”，在同虾夷交界的地方设派出所，以此把虾夷纳入了自己的秩序内。

（五）对荷兰方面

海禁时期，日本只与西方国家中的荷兰建立了贸易关系。幕府批准在长崎设

① 荒野泰典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版，第 37 页。

② 徐宁婧：《中国与日本在清代的贸易信牌》，载《文史杂志》，2003 年 03 期，第 69 页。

③ 陈景彦：《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载《东北亚论坛》，2003 年 05 期，第 80 页。

④ 陈秀武：《海上威胁与德川幕府时期的虾夷地归属认知》，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04 期，第 44 页。

立商馆，条件是要求荷兰商馆馆长每隔数年前往江户谒见将军，对能进行贸易表示感谢。^①幕府通过这些仪式想表达的，无非是外国服从自己的虚荣。

综上所述，“大君外交制度”虽然在政治实体的角度来说远达不到东亚秩序的标准和影响力，但幕府渴望试图建立一种以日本为中心，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都参与其中的等级秩序，即属于日本的“华夷秩序”的心态一目了然，但由于“锁国”政策和国力限制，“大君外交体制”终归只是后人的描述，一个超出了现实的构想。即便如此，日本也通过后来的种种努力，最终把琉球和虾夷纳入自己的版图，不得不让人警醒。

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如第一章所述，松冈洋右的构想是把新秩序所涉及的地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通过承认各大国对其实际控制或有深远影响地区的指导者地位，以换取各大国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承认，把世界划分为日、德、意、苏、美、英治下的六个“共荣圈”。

在具体政策上，首要问题是“尽快解决支那事变”，核心内容是“武力南进”。^②《对南方政策试案》中叙述了日本的南进计划：范围上，“帝国南方推进的第一阶段目标区域是，除菲律宾、关岛之外，夏威夷以西的全部地区，首先在法属印度、荷属印度、英属缅甸、马来亚及其海峡殖民地掌握实权，渐渐地向其他地区推进，视美国的态度将菲律宾、关岛也囊括其中”；措施上，在英法荷的殖民地，掀起“独立运动”以排除其主权。在部分地区，由日军直接行使武力。虽然政策上说是“独立”，但每一条后都写着“与帝国签订以军事经济联盟为名目的保护条约，从而掌握实权”。^③后来在松冈所写的《对德、意、苏交涉方案要纲》中也明确提到“帝国在大东亚共荣圈地带负有政治上的指导者责任”，“对于没有独立能力的民族，按照其能力尽可能予以自治，并有帝国指导其统治”。^④可以看出，日本所谓从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只不过是日本接过来接力棒，“共荣圈”所涉及的地区最终将沦为日本的附属。

① 李永春、张晓刚、杨华：《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 17 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载《大连大学学报》，2012 年 05 期，第 70 页。

② 臧运祜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61 页。

③ “对南方策试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600。

④ “对独、伊、苏交涉案要纲”，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上，東京・原書房，1989 年版，第 176 页。

随着与西方交涉的破裂，松冈所持的“共荣圈”构想宣告破产，接过这柄大旗的东条英机挑起战争，用“战争即建设、建设即战争”的法西斯理论开始武力征服。并把共荣圈细化为以日本为中心向外辐射，层层嵌套的结构，划分的标准则完全是基于日本的国防经济利益。^①进一步，东条设立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决定机构——“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牢牢把控势力范围内人民经济、文化、人口、教育等方方面面；以及执行机关——“大东亚省”^②，独自掌管整个大东亚地区政务的实施，甚至有在本地区的殖民事务，而该地区的外交事务由一般行政官员负责。国家关系降格为日本的国内政治，“共荣圈”从明文上堕落为殖民地。

第三节 两时期的比较

通过列举日本海禁时期和“共荣圈”时期的“自他认识”以及基于认识作出的政策决策，可以发现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行为均具有一致性（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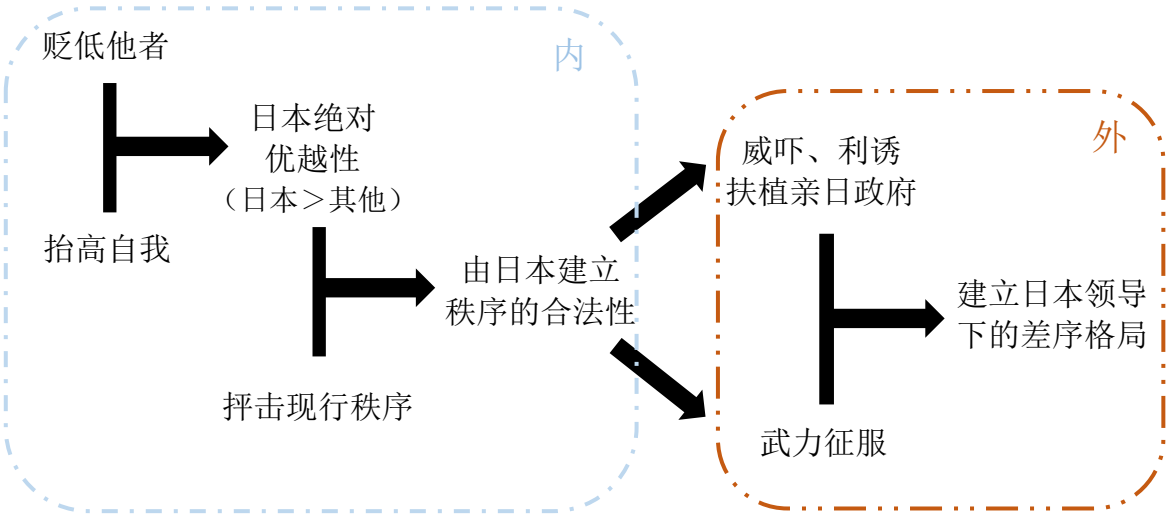


图 3：两时期日本的“自他认识”如何导向对外政策

① “大東亜共栄圏建設原案（草稿）”第一書 建設大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14060850500。
② “大東亜省設置ニ関スル件ヲ定ム”， 国立公文書館，A03010012300。

一、 内在逻辑

海禁时期儒者否认满清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耻笑其为蛮夷文化，拉低了清朝相对于日本的地位。进一步，批判中国皇权皆被乱臣贼子篡夺，圣人之道早已名存实亡，拉低了包括历史上的中国相对于日本的地位。这一时期日本与西方接触尚浅，但按照传统华夷思想自然而然地把西方当作南蛮，以至于地位比中国还要低。“共荣圈”时期日本则批判西方“自由主义”蕴含着纷争，英美在国际上所讲和平乃是“伪善”，降低了西方的地位。与此同时，蔑视中华民族甚至否认国家性，中国相对日本的地位达到最低点。两时期均通过贬低他者来相对地提高日本地位。

然而仅有相对是不够的。海禁时期部分儒者和国学者从日本自身出发寻找素材印证日本特殊性。表彰日本文化，宣称日本为神国，天皇为神的后代，日本所行为神道。“共荣圈”时期更是如此，任何宣传离不开神国史观和吹嘘天皇政治的优越性。从而主动拔高日本的地位。这一贬一捧，就得出了日本相对于所有国家的优势地位，树立起绝对优越性。

这一地位逆转面临的障碍就是“低于”日本的他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海禁时期是中国的“华夷秩序”，“共荣圈”时期是英美主导“凡华体系”。要想真正走向序列的顶点，日本开展了对现行秩序的攻击，加上宣扬自身国内政治的优越性，得出世界应当仿照日本，建立等级制的国际秩序。

可见，两时期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当然细节上会有一些区别。比如“共荣圈”时期政府并不特地宣传对中国的蔑视思想，甚至有人提出要转变对华认识，肯定其中的某些方面，这一来是因为日本想要化解中国国内的抗日情绪。二来是把中国地位提高以便于拉拢来共同对抗西方国家，伪装成平等的样子。而对于西方国家，并没有进行民族、文化上的批判，这其实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飞速发展正得益于西方文化、科技，很难加以贬低。此外，两时期中比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海禁时期主要批判中国，而“共荣圈”时期矛头指向英美，这是因为它们分别是两时期秩序的缔造者，对日本威胁最大，在“位置”判断上仅次于日本，而实际情况上体量又都大于日本，是日本在序列中爬升的最大障碍，自然要着力铲除。

二、 外在表现

外在方面有两条路线：对于国力弱小的，直接武力征服；国力强盛的，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甚至故意制造分裂，扶植亲日政府。比如海禁时期对琉球、虾夷，就采取了前者。对中国、荷兰则是用商业利益捆绑，再由政府按朝贡加以解读。“共荣圈”时期，对于东南亚部分国家直接使用武力征服，另一部分则扶植国内的亲日反殖民运动，借机取代英法荷的地位。对中国，既有战争，也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和“满洲国”。在取得的结果上，“大君外交体制”和“共荣圈”都是日本的自娱自乐，除其傀儡外无人响应，最终也都走向失败。

这两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海禁时期更多的是日本自我满足的想象，秩序建设程度很低。“共荣圈”不但有理论指导，还有行动路线，在实践中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这是由于深受帝国主义殖民地思维和法西斯主义极端思维的影响。

与此同时，虽然近代日本更多地使用西方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但其在具体行动上仍然暗含华夷思想，比如把对台湾的政策称为“理藩”；融合殖民主义和华夷思想，把殖民地国家视为上等国，被殖民地国家视为下等国；援引“王道乐土”“各得其所”“一视同仁”等中国古代描绘华夷秩序美好的词语来获得殖民统治正当性和超越西方的理论依据。^①

综上所述，海禁时期和“共荣圈”时期虽然相距 300 多年，但“自他认识”——“位置”判断——政策或主张的横向推理完全一致，“自他认识”和政策或主张的纵向比较在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上均有很大程度的相似。因此，“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型华夷秩序在近代的又一次尝试，日本所主张的“天皇治下，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也不过是加深等级意识的“华夷秩序”而已。300 年前，日本通过“大君外交体制”深化了对琉球和虾夷的影响，最终纳之为国土。300 年后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较，范围更广，野心更大，对周边国家的危害更为严重。然而，由于此时日本“位置意识”与现实严重脱节，“大东亚共荣圈”终归是日本的黄粱美梦，更加难以实现。最终，随着日本的战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① 长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14 年版，第 32，33 页。

结 论

日本在 1940 年突然把“新秩序”转变为“共荣圈”，既有基于国际形势判断的偶然性，也有“亚洲主义”历时发展，民族性格中“位置意识”谋求占据序列顶点的必然性。不管如何，“大东亚共荣圈”本质上是日本把国内制度投射到亚太地区的一次尝试，基于自民族中心主义，贬低其他国家、民族，宣扬日本文化、制度的优越，为其掌控整个世界提供合法性。但最终这一尝试随着日本投降宣告失败，从本文的观点来看，这一失败是可以预见的——“中<西<日”的“位置”判断导致日本敢于推行“共荣圈”政策，而这一主观判断与现实的差距就为政策的破产埋下了隐患。日本在近代虽然花费大量钱财研究中国，也确实准确、客观地把握了中国的国家现实，但长期的蔑视心态使日本统治者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意识、抵抗力和凝聚力，以致于大陆战场消耗了日本大量的力量。日本对西方的看法也存在偏颇，本来依靠西方文化、科技飞速成长的日本，却开始批判西方，研究“现代性的超越”。皇国史观蒙蔽了双眼，盲目自信促使发动太平洋战争。认识的错位导致现实的惨败，这是合情合理且发人深省的。

回到今天的中日关系，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平静期。日本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一度丧失外交的自主权。两国建交后日本自然用“发达”国家的视角来审视“发展中”的中国。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经济持续萧条，在没有诸如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帮助下，中日两国的相对位置判断变得扑朔迷离，这也就使得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不断摇摆，时而缓和关系，时而渲染“中国威胁论”，甚至在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由于认识的缺乏导致的。未来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一方面需要日本摆清自己的位置，不要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加深对日本的理解，为其创造识别双方的条件，给予其在序列中的稳定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1][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日]子安宣邦著：《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臧运祜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文期刊文章

[1]陈景彦：《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05期。

[2]陈玉聃：《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7卷04期。

[3]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4]程文：《近卫文麿思想初探》，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

- [5]陈秀武:《海上威胁与德川幕府时期的虾夷地归属认知》,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4期。
- [6]戴海滨:《近卫笃磨与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载《学术月刊》,2016年09期。
- [7]冯玮:《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02期。
- [8]范业红:《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载《理论观察》,2014年03期。
- [9]郭丽:《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载《日本研究论集》,2003年。
- [10]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 [11]韩东育:《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03期。
- [12]黄丽娟:《从拉康“镜像说”解读“他者”的含义》,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 [13]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 [14]吕万和、崔树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载《世界历史》,1983年04期。
- [15]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载《历史研究》,2010年06期。
- [16]李永春、张晓刚、杨华:《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载《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05期。
- [17]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历史研究》,2000年03期。
- [18]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载《历史研究》,2005年03期。
- [19]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载《国际观察》,2005年04期。

[20]史桂芳：《日本昭和研究会与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21]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载《历史研究》，2015年05期。

[22]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载《日本学刊》，2003年02期。

[23]徐宁婧：《中国与日本在清代的贸易信牌》，载《文史杂志》，2003年03期。

[24]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载《日本学刊》，2013年02期。

[25]于逢春：《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26]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载《世界历史》，1997年03期。

[27]周颂伦：《华夷变态三形态》，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4期。

[28]赵德宇：《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

学位论文

[1]范业红：《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演变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韩东育，2015年3月提交。

[2]谢桂娟：《华夷观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潘畅和，2015年6月提交。

日文档案资料

- [1] “大東亜省設置ニ関スル件ヲ定ム”，国立公文書館，A03010012300。
- [2] “日本国、独逸国及伊太利国間三国条約”，国立公文书馆，A0302238220。
- [3] “松岡外務大臣「リ」外相会談記録（要領）”，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04200。
- [4] “世界情勢の変動に対処すべき帝国外交施策要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0900。
- [5] “帝国外交方針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100。
- [6] “対南方策試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011600。
- [7] “帝国外交方針要綱”（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1200。
- [8] “帝国政府声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28700。
- [9] “帝国外交施策要綱 私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29700。
- [10] “基本国策要綱”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544700。
- [11] “昭和一一四、二八〇〇六、倫敦、八月二二日、重光大使発、有田外務大臣宛” “昭和一一四、二七九六六、海牙、八月二一日、石射公使発、有田外務大臣宛”，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0775900。
- [12] “大東亜会議開催に関する経緯概要（執務報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2957900。
- [13] “東郷大使発、有田外務大臣宛” “東郷大使発、松岡外務大臣宛”，《日、蘇中立条約關係一件》第一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4013480200。
- [14] “帝国政府声明（昭和 13 年 1 月 16 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1110428100。
- [15] “昭和 13 年 11 月 3 日の政府声明”，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070900。
- [16] “情勢推移に伴ふ帝国国策要綱”，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183800。
- [17] “内閣総理大臣御説明案”，防务省防卫研究所，C12120184000。
- [18] “対南方施政要綱”，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2120207100。
- [19] “二月二八日 第九〇回連絡会議”《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議事録》，防卫省防卫研究所，C12120259000。

[20] “昭和 16 年 4 月 14 日 日ソ中立条約成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12120377200

[21] “大東亜共栄圏建設原案（草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14060850500。

日文著作

[1] 本居宣長著：《増補本居宣長全集》第 9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27 年版。

[2] 波多野太郎：《過去と現在：近衛霞山公五十年祭記念論集》，東京・財団法人霞山俱樂部，1955 年版。

[3] 城北外史著：《近衛文麿の思想と経綸》，東京・大文字書院，1937 年版。

[4]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東京・原書房，1989 年版。

[5] 长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14 年版。

[6] 稲葉正夫編：《太平洋への道》別巻《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 年版。

[7] 大本営陸軍部戦争指導班：《機密戦争日記》，東京・錦正社，1998 年版。

[8] 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全集》第 2 卷，東京・聖文閣，1939 年版。

[9]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日中文化交流の研究」歴史班編：《芳洲文集》（雨森芳洲全書巻 2），大阪・関西大学出版・広報部，1980 年版。

[10]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東京・講談社，1986 年版。

[11] 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 年版。

[12] 桂島宣弘著：《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徳川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 年版。

[13] 荒野泰典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版。

[14] 河西晃祐著：《大東亜共栄圏——帝国日本の南方体験》，東京・講談社，2016 年版。

- [15]近衛篤磨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磨日記》第3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
- [16]家永三郎等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21》，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版。
- [17]満鉄調査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総括資料》総篇，1940年版。
- [18]蠟山政道著：《世界の变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巖松堂，1938年版。
- [19]蠟山政道著：《東亜と世界：新秩序への論策》，東京・改造社，1941年版。
- [20]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序言，東京・東洋文庫，1958年版。
- [21]千倉豊編：《近衛文磨清談録》，東京・千倉書房，1936年版。
- [22]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 4》，東京・有斐閣，1970年版。
- [23]松岡洋右著：《動く満蒙》，東京・先進社，1931年版。
- [24]松岡洋右著：《道義日本と皇道政治》，東京・政党解消聯盟出版部，1935年版。
- [25]松岡洋右著：《須らく堅忍持久せよ》，東京・国民精神総動員中央聯盟，1938年版。
- [26]山鹿素行著：《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第12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
- [27]松岡洋右著：“皇道外交宣言”“我民族的理想実現に邁進”，《松岡外相演説集》，東京・日本国际协会，1941年版。
- [28]松本三之介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版。
- [29]滝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大典》第9卷，東京・啓明社，1928年版。
- [30]尾崎秀実著：《嵐に立つ支那：轉換期支那の外交・政治・經濟》，東京・亜里書店，1937年版。
- [3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5年版。
- [32]熊沢蕃山著：《日本思想大系 30》（後藤陽一、友枝龍太郎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版。

[33]新井白石著：《日本思想大系 35》（松村明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75 年版。

[34]霞山会編：《東亜同文会史 昭和編》，東京・霞山会，2003 年版。

[35]竹内好著：《現代日本思想大系・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 年版。

[36]エス・ビー・ビー編：《大東亜共栄圏の時代：興亜を目指した日本とアジアの歴史》，東京・政治経済研究会，2006 年版。

日文期刊文章

[1]坂井雄吉：《近衛篤磨と明治三十年代の対外硬派》，载《国家学会雑誌》，1970 年，第 83 卷，第 3、4 号。

[2]河原宏：《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大東亜共栄圏の思想と政策》，载《社会科学討究》，1975 年 3 月号。

[3]近衛篤磨：《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载《太阳》，1898 年第 1 号。

[4]近衛文磨：《英米本位の平和主義を排す》，载《日本及び日本人》，1918 年 12 月号。

[5]近衛文磨：《満州事变六周年に際して》，载《支那》，1937 年 9 月号。

[6]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载《朝鮮学報》，1969 年 10 月号，通号 53 期。

[7]矢部貞治：《欧州における戦争の危機》，载《改造》，1937 年 8 月号。

[8]矢部貞治：《第一線 指導者と被指導者》，载《読売新聞》，1940 年 10 月 17 日。

[9]山室信一：《未来への回憶:他者認識と価値創出への視点》，载《国際文化会館会報》，2003 年 12 月，14（2）期。

[10]杨沛：《雑誌『旅』に見られる近代日本人の中国観について》，载《立教大学ランゲージセンター紀要》，2015 年 10 月号。

[11]源川真希：《「大東亜共栄圏」思想の論理とその帰結——政治学者矢部

貞治を中心に》，载《人文学報》，2000年，通号306。

[12]佐古丞:《松岡洋右の中国認識と対応--満州事变まで》，载《法学論叢》，1987年9月，121（6）期。

致 谢

外交学院的三年学习生活令我难忘，衷心感谢导师陈涛老师对我的督促、鞭策与鼓励。本文选题的最初灵感正来自于陈涛老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无论是论文的整体设计，资料搜集的思路，还是具体概念的细节拿捏，都离不开陈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严格教诲。我深受陈涛老师严谨的学术作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感染，才有机会完成这篇论文。在此，请允许我向陈老师表达我最真挚的感谢！

其次，感谢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给我机会赴日交流。在半年的短暂时光里，我亲身体会了日本的生活，粗浅了解了日本人的文化和性格。并在国会国立图书馆中查找了大量资料，为论文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最后，感谢外交学院给我机会略微涉猎中日关系这个复杂而趣味的领域，培养我初步具备研究的基本素养。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感谢冯春帮我审稿，感谢杨家嘉借我电子书籍。

特此致谢！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作者： 乔柯

专业： 外交学

导师： 陈涛

答 辩 委 员 会 成 员	姓 名		职 称	所 在 单 位
	主 席	熊 炜	教 授	外交学院
	委 员	夏 莉 萍	教 授	外交学院
		齐 小 林	副 教 授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部制表